

多重邊緣的自覺： 洗玉清嶺南研究的重層視域*

顏 訥**

* 本文最初受須文蔚教授國科會研究計畫「慈幼印書館於臺港澳跨區域文學傳播研究」啟發，開始關注洗玉清在澳門的活動。初稿與修訂稿分別於 2022 年「文學／海洋／島嶼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雛鳳清聲——文哲青年夏季論壇」上宣讀，感謝胡曉真老師悉心指導，筆者受益良多。典藏於香港圖書館之文獻，承蒙香港中文大學李薇婷提供檔案。寫作過程獲 Joachim Boittout、蔡佩含、李薇婷、翁智琦、湯舒雯、蕭聿孜等學友以及顏崑陽教授回饋，銘感於心。審查期間又蒙兩位匿名審查人與主編細心審閱，提供珍貴修改建議，在此一併致謝。收稿日期：2022 年 12 月 14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 年 7 月 17 日。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學者、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摘 要

清末民國有「嶺南才女」之稱的冼玉清(1895-1965)，除了以古典詩文活躍於男性文人社群中，還是少數出生澳門，在嶺南文化場域成功立足的女性學者。她以樸學傳統治嶺南文史，發揮影響力。冼玉清是嶺南歷史上編寫女性著作目錄的第一人，也是廣東女性研究學術脈絡開創者。

冼玉清一生流動於澳門、香港、廣東之間，她的嶺南研究揉雜廣東、澳門、香港華人文化，以及葡萄牙、英國殖民經驗所形成的「重層視域」。明代以來，澳門作為「南天樂土」，與嶺南文化社群保持緊密聯繫。一方面被中原文化視為邊陲，同時又是西方文化輸入中國的基地。不過，除了從本土引進人才以外，部分澳門學者也承繼移民社會、殖民地的特殊歷史條件，活動於廣東、香港、澳門，發展出具有嶺南特色的治學風格。其中，冼玉清是較早論述澳門在中國近代史重要意義的學者，她也不懈地在嶺南文獻中，挖掘處在不同邊緣位置的人物與文化。本文突出冼玉清的「多重邊緣自覺」，包括嶺南相對於北方文化中心之邊緣，以及嶺南研究中澳門、香港研究之邊陲，還有民國女性在知識場域中從邊緣擠向中心的處境。進一步討論易代之際，冼玉清如何在澳門接受改良廣東的新式教育，又在世變中透過建構嶺南文史研究，將澳門經驗帶回廣東文化圈，並在戰爭時期於香港透過歷史書寫實踐民族主義。

關鍵詞：才女、女性知識分子、冼玉清、澳門、嶺南

前言：近代嶺南知識女性的多重邊緣自覺

有「嶺南才女」、「不櫛進士」之稱的澳門女性知識分子冼玉清（1895-1965），是嶺南婦女史研究開創者，很早就決意為教育和學術終生不婚，以治地方史為政治參與，在當時被視為特立獨行的女性。盧伯浩在〈冼玉清女士小傳〉中，記述她在嶺大以英語教廿四史，積勞成疾，「然學自此益深邃矣」。又因擔任圖書館、博物館長，赴北京大學修習考古學，僅三年就畢業。在大學任教，還同時助修《廣東通志》，「以一女子而負荷教化之任如其重，誠難可貴矣！」¹ 冼玉清受新式教育，並以女性史學家身分，從澳門出發，在嶺南學術社群順利取得重要位置，同時擔任公職，在當時並不多見。此外，冼玉清一生活躍於廣東、香港、澳門文化圈，成為比較早重新定位澳門在嶺南地區扮演「承接者」意義的學者。在她的嶺南研究成果中，澳門在清末民初成為廣東知識分子政治、教育與女權改革實驗基地，突出澳門、香港與廣東文化傳播在嶺南研究重要性。

不過，冼玉清並沒有在公領域發表女權論述，治學風格與舊體詩詞、駢文創作，又使她經常被形容為傳統守舊才女，甚至在 1950 年代被編列為封建保守人士。冼玉清一生經歷兩次政權更替，應該怎麼理解一位女性學者形象，在不同時代新舊並陳的矛盾性？移動於澳門、香港、廣東之間，求學、任職、避難經驗，給予她哪些思想資源與文化養分？又如何表現在嶺南文史研究特色中？本文認為，若從港澳文

1 盧伯浩，〈冼玉清女士小傳〉，《新潮》（香港），期 1（1948 年 9 月），頁 45。

化、嶺南歷史與知識女性的多重邊緣自覺，來詮釋她的知識養成與學術貢獻，能夠深刻理解冼玉清複雜的生命樣態。

因此，本文以活躍於嶺南的澳門女性知識分子冼玉清為例，探討她在知識建構、文化傳播所扮演的角色，並以嶺南文化中港澳互動關係為框架，特別著重她的「多重邊緣自覺」——嶺南相對北方文化中心的邊緣地位，嶺南研究中澳門、香港的邊緣位置，以及民國時期女性在知識場域的邊緣角色。本文主張，冼玉清嶺南文史研究的重要特色，在於她能融合了澳門、香港、廣東的華人文化，以及葡萄牙與英國殖民經驗，進而形成獨特的「重層視域」。筆者期望透過這樣的探討，將澳門文化流動的特性納入嶺南文化框架，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冼玉清一生積累的嶺南文化研究成果，特別是嶺南婦女史系列研究，已經擺脫治地方史來展示帝國實力的功能，朝向系統性建構嶺南文化努力。冼玉清案例帶來的「多重邊緣」視角應如何解釋？嶺南學術研究傳統始於漢代，只是因長期被北方人視為邊陲，又有「南蠻」之稱，沒有受到重視。歷來北方官僚與文人南方敘事中，多以獵奇記趣視角再現嶺南。不過，嶺南文化研究重要性因廣東於17世紀成為中國與世界交流衝突地，同時參與建立禮治秩序，²發生改變。

2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頁32-33。相關論述參David Faure, "Becoming Cantonese, the Ming Transition," in Tao Tao Lui and David Faure, eds., *Unity and Diversity: Local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i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7-50. 科大衛、劉志偉，〈宗族與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明清華南地區宗族發展的意識形態基礎〉，《歷史研究》，期3（2000年6月），頁3-14。

特別是 19 世紀後廣東重大政治事件，凸顯中央力量衰微，地方對改革紛紛提出主張，建立本地秩序與文化認同。³ 在中央與地方軍事、經濟、政治局勢、文化資源相互補充和角力中，廣東逐漸在晚清形構新的國家觀與地方意識。知識分子透過「廣東文化史」論述召喚地方情感，主張粵人治粵。即使辛亥革命後，廣東知識分子對中國政治產生很大影響力，但是，1927 年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廣州僅剩「革命聖地」名聲，⁴ 且廣東文化價值仍被低估。⁵ 如陳仲章（生卒年不詳）撰〈廣東學術的今昔與今後學人的要務〉，特別強調 1894 年興中會成立，國民政府以廣東為基地發動革命，中華民國文物制度、法令規章多由三民主義演化而來，「可見廣東原為近代中國學術文化重心之所寄，惟近年來已後勁未繼，就全國看，廣東文化似有寢就低落之勢」，⁶ 因而疾呼廣東學人應振興廣東學術發展。冼玉清雖無直接參與政治；但是，她在嶺南研究中隱含的地方意識與政治關懷，應置於廣東特殊歷史發展中詮釋。

3 參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頁 34。

4 參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頁 37。

5 唐小兵評《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指出該書將歷史研究過度集中在政經中心的取向——如上海史研究——朝向過去被認為是「蠻夷之地」的廣東「位移」。唐小兵，〈「廣東文化」觀的建構——評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二十一世紀》，期 103（2007 年 10 月），頁 134-140。

6 陳仲章，〈廣東學術的今昔與今後學人的要務〉，《文會叢刊》，期 1（1948 年 9 月），頁 35。在該篇評論中，陳仲章舉出三個案例證明他對廣東學術發展的擔憂：一、教育部召開全國劃分文化區會議，某大學校長以廣東文化低落，否決在廣東設文化區的提議；二、中央研究院評議會選舉院士，廣東人當選寥寥無幾；三、胡適十年學術獨立計畫，廣東中山大學並未入選。

雖然嶺南文化研究在劃定範圍時擴及澳門，但是，歷來還是以廣東文化為主。有趣的是，澳門從明代作為「南天樂土」，在廣東人的澳門敘事中，亦不乏獵奇視角。⁷ 澳門是軍事與番邦夷人交易、入貢之所，作為廣東延伸，明末並未設立專員，龐尙鵬（1524-1580）是第一個關注澳門問題、並留下文字記載的中國人，將澳門視為廣東省「禍切門庭」大事。⁸ 地方志《澳門記畧》雖記載詳實，但對來澳貿易國家仍有許多錯誤認知，⁹ 澳門學反而是由外國史學家先提出的研究取向。¹⁰ 不過，隨著 1988 年《中葡聯合聲明》及其附

-
- 7 有關廣東文人南來澳門，在詩文中描述在澳門體驗異國風俗、殖民地文化的驚異、憤怒與哀悼之感，可參鄭煒明，《澳門文學史》（濟南：齊魯書社，2012）。
 - 8 參黃啟臣，《澳門通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頁 6。印光任、張汝霖著，趙春晨校注，《澳門記畧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頁 66。
 - 9 根據趙春晨校注，雖然印光任與張汝霖對外國事物的了解，在厲行海禁的環境下已經是佼佼者，但從《澳門記畧》中將殖民澳門的「澳蕃」，也就是明代稱作「佛朗機」的葡萄牙人，錯認為「西洋意大利亞」（義大利），並延續《明史》對區辨歐洲各國的混淆情況。參印光任、張汝霖著，趙春晨校注，《澳門記畧校注》，頁 7。
 - 10 韋慶遠指出，澳門雖是「彈丸之地」，但因葡萄牙租居歷史，傳教士刺激中西文化交流，使得此地成為既小卻又緊密牽涉世界局勢脈動的城市，難能可貴。他也注意到，澳門研究被稱為澳門學，反而是外國歷史學家先提出。研究澳門檔案往往需要多語能力，對學者的挑戰較大。錢乘旦亦表示葡萄牙的澳門研究起步較早，以海外省的觀點進行大量研究，屬於「葡萄牙視角」。然而，中國視角下的澳門僅是廣東沿海偏僻的小半島，幾乎被學者忘卻，相關研究零星，因此直到中共改革開放以前，中國視角的澳門研究其實很缺乏。韋慶遠，〈澳門史研究及澳門學〉，收入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編，《嶺南歷史與社會》（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3），頁 81-91。錢乘旦，〈關於澳門學的幾點思考〉，《澳門理工學報》，卷 23 期 4（2020 年 10 月），頁 25-31。

件換文生效，澳門進入 12 年過渡期，澳門研究才由學術機構與官方合作推進。2003 年由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的《嶺南歷史與社會》，廣東學者韋慶遠撰寫〈澳門史研究與澳門學〉一文，呼籲香港青年學者運用多語能力投入澳門檔案學研究，可以視為學術社群跨地區整合資源，將澳門研究納入嶺南文史建構歷程的嘗試。¹¹ 然而，冼玉清很早就從自己在澳門生活的經驗出發，撰寫帶有見證性質的歷史掌故，敏銳地選擇幾個切面，凸顯澳門在近代中國發展史的特殊位置。此外，近年倡議建構嶺南學的討論中，學者也注意到女性史的關注度不足，冼玉清的學術成就再度被標誌出來。¹²

冼玉清歷經清末澳門改革運動，民國成立後決心投身廣東文化研究，二戰時期在香港、粵北等地任教，中共建國後亦持續鑽研嶺南文史，成為廣東學術圈代表人物，是少數南方知名女性學者。這種流動的路徑，代表除了從中國引進人才到澳門，部分澳門學者也承繼移民社會、殖民地歷史條件，掌握多種語言，頻繁流動於廣東與香港。此外，冼玉清 1912 年宣告為學術和教育獨身，看似作風新派，卻堅持舊文體創作，治學方法始終沒有脫離考據，可以看出嶺南知識女性的形象，深具新舊文化折衝的張力，如陳序經在〈廣東與

11 韋慶遠，〈澳門史研究及澳門學〉，收入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編，《嶺南歷史與社會》，頁 81-91。

12 喬玉紅、喬素玲、劉正剛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嶺南研究學術資源不斷整合的過程中，對嶺南女性史的研究卻始終處於冷清的狀態，留下許多可開發的議題。其中，歷來再現嶺南才女日常生活、知識來源與家庭身分地位的材料，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是現存最早嶺南女性史研究的著作。喬玉紅、喬素玲、劉正剛，〈收聽女性的聲音：「嶺南學」建設應關注的話題〉，收入左鵬軍主編，《嶺南學》（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輯 2，頁 27-41。

中國〉(1939)形容廣東文化：「既是舊文化的守護者，又是新文化的先鋒隊」。¹³

洗玉清相關研究多生平概述、紀念文章或隨筆，如：黃任潮〈洗玉清教授傳略〉、袁鍾仁〈嶺南才女洗玉清〉、《洗玉清誕生百年紀念集》等。¹⁴ 陸鍵東〈一個女子與一個時代〉是目前對洗玉清生命歷程最深刻的考察。¹⁵ 不過，若涉及洗玉清的遷徙經驗，唯陳樹榮《洗玉清與澳門》全面蒐集與澳門有關資料，包括未刊手稿，提供本研究重要基礎。¹⁶ 即使已經有研究洗玉清嶺南文史貢獻的論文，也多半泛論較為著名的文獻學著作，唯對婦女史論著《廣東女子藝文考》有比較深入的討論。¹⁷ 因此，本文在標舉「重層視域」的框架下，特意撿擇洗玉清較少被注意的澳門歷史掌故，以及挖掘其恩師陳子褒(1862-1922)女權教育的論著，探究清末澳門特殊歷史環境形成的公共領域，觀察她如何透過嶺南史考據突出

13 陳序經，〈廣東與中國〉，《東方雜誌》，卷36號2(1939年1月16日)，頁43。

14 黃任潮，〈洗玉清教授傳略〉，收入丁身尊主編，《廣東文史資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輯64，頁103-124。袁鍾仁，〈嶺南才女洗玉清〉，收入廣州市文史研究館編，《廣州的故事》(廣州：花城出版社，2005)，集2，頁261-264。陳樹榮主編，《洗玉清誕生百年紀念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

15 陸鍵東，〈一個女子與一個時代〉，《純文學》，復刊第2期(1998年6月)，頁15-25、97-108。

16 陳樹榮，《洗玉清與澳門》(澳門：君亮堂出版社，2013)。

17 評價洗玉清嶺南文史貢獻的前行研究中，以《廣東女子藝文考》一書為對象的討論，有比較深入的分析。包括胡倩，〈洗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價值三論〉，《澳門研究》，期80(2016年3月)，頁182-191、199。魏愛蓮，〈重拾過往——1636年至1941年間的女性編者與女性詩歌〉，收入方秀潔、魏愛蓮編，《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79-103。

中國近代革命史上澳門的重要性。此外，雖然《廣東女子藝文考》的史學貢獻已經被注意，但是，本文將與她的生命經驗交叉分析，詮釋冼玉清終生投身教育的獨身主張。接下來，也會從她嶺南研究中澳門與廣東的互動關係為線索，分析灌根學校創辦人陳子褒繼承並改良康有為萬木草堂教學方法，在澳門施行女子、方言教育，影響她的性別意識與地方認同。本文認為，當考據學不再佔據「全國性舞台」學術主流位置，冼玉清在廣東、澳門與香港三地發展嶺南文獻學，可視為思想運動在「地方」的發生。

一、 冼玉清重層視域的形成

1895年，冼玉清誕生於澳門富裕的商人家庭，她日後成為清末民國嶺南地區少見的女性歷史學家。冼玉清的祖父母因戰亂逃離廣東南海西樵，定居澳門，到了她這一代，在西樵故鄉已無人識，視澳門為家鄉。她在澳門灌根學校完成基礎教育，1916年21歲時，才離開陳子褒的教育，赴香港教會名校聖士提反女校（St. Stephen's College for Women）學習兩年英語。冼父原先希望栽培女兒英語能力，日後能協助他在香港開拓事業，¹⁸ 她卻因此得以在嶺南大學用英文教授中國史。冼玉清性格低調簡樸，第一次隨父母到廣州，就深

18 黃任潮在〈冼玉清教授傳略〉中提到冼玉清父親是一位具有開拓性格的企業家，彼時，他看出殖民地香港做生意，良好的英語能力很有用處，因此將冼玉清送往聖士提反女校讀英文，打下英文基礎。黃任潮，〈冼玉清教授傳略〉，收入丁身尊主編，《廣東文史資料》，輯64，頁103-124。

受嶺南大學僻靜的環境吸引，決定離開繁華的香港，轉入嶺大附中，兩年後直升文學院，主修古典文學。¹⁹ 30歲從嶺大畢業後，冼玉清從助教開始做起，終身任教於母校國文系，專治嶺南文史。她的求學歷程正是近代中國教育現代化轉型的縮影，輾轉就讀私塾、新式教育、女校與教會學校的經驗，也表現澳門、香港、廣東學生流動性高，且中西、新舊、多語混雜的教育特色。雖然冼玉清一生主要活躍於嶺南文化圈，但是，她1929至1930年間遊歷北京期間，結識倫明（1875-1944）等北方學者，詩文受陳恒（1899-1984）、張蔭棠（1892-1957）等人賞識，²⁰ 又獲燕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馬鑑（1883-1959）與清華大學力邀留京講學。最後，嶺大校長鍾榮光（1866-1942）以「服務桑梓」為由，極力勸說她南返廣東任教，冼玉清放棄進入燕大與清華的機會，顯露對地方的深厚情感。冼玉清投注畢生精力，專治嶺南文獻，貢獻卓著，她在1938年升等為教授，1943年由教育部鑑定為甲級正教授。1952年中共針對大學進行大規模院系調整，嶺大併入中山大學，冼玉清轉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一直到1955年退休以後，都還是以詩人、學者身分持續寫作古典詩詞，整理嶺南文獻。²¹

-
- 19 冼玉清在〈自傳〉中回憶離開香港到廣州讀書的決定：「香港終是花花世界，與我的性情不相宜。有一次父母帶我去廣州玩，參觀嶺大，我覺得這地方遠離市塵，真是藏修之所。」冼玉清，〈自傳〉（未刊稿，1958年），轉引社潮，〈精緻溫潤的人生—嶺南學人冼玉清〉，《決策與信息》，期340（2013年3月），頁62；陸鍵東，〈一個女子與一個時代〉，《純文學》，復刊第2期（1998年6月），頁18。
- 20 袁鍾仁，〈嶺南才女冼玉清〉，收入廣州市文史研究館編，《廣州的故事》，集2，頁262。
- 21 冼玉清生平資料，參見陳樹榮，《冼玉清與澳門》；莊福伍，〈冼玉

洗玉清在澳門求學時，恰好見證澳門風起雲湧的社會改革運動。清末正逢中國教育現代化過渡期，澳門因特殊的殖民歷史，成爲嶺南現代中文教育實驗根據地。洗父極重兒女教育，1903年，洗玉清8歲，被父親送入林老虎私塾，²²接著進入沈史雲（生卒年不詳）與革命黨人鄧仲澤（1880-1964）等人捐資創辦的「啓明學校」短暫就讀。在〈自傳〉與〈澳門與維新運動〉一文中，洗玉清將「啓明學校」納入維新派在澳門的活動，表示科目安排「力主趨新」，以西方基礎教育主張「五育」概念分科，教師也多聘留日學生，「於灌根學校以外別樹一幟」²³。洗玉清離開傳統私塾後，在啓明學

-
- 清先生年表》，收入佛山大學文史研究室、廣東省文史館編《洗玉清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4），頁866-882；黃任潮，〈洗玉清教授傳略〉，收入丁身尊主編，《廣東文史資料》，輯64，；黃任潮，〈洗玉清的生平及其著作〉，《嶺南文史》，期1（1983年5月），頁73-81；施立松，〈約素含娟總自然〉，收入施立松著，《民國風度：黑暗處的明燈》（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4），頁327-334。
- 22 洗玉清在〈自傳〉中具體記述在澳門受啟蒙教育的時間，以及她對不同階段教育環境的評價：「我八歲開學，在一個林老虎的私塾讀書。九月至十一歲，在澳門啟明學校肄業，該校教員是很開通的，那時已學體操、算數、地理、唱歌等科目了。後來，我父訪得一位陳子褒先生，學問是極好的，開了一間灌根學校，父親命我往游陳門。」〈自傳〉（1958年未刊稿），轉引陳樹榮，《洗玉清與澳門》，頁3。筆者目前尚未尋得林老虎私塾教學內容與方法之記載，無法確知洗玉清八歲入學時接受的教育是否為傳統中國私塾教育。不過，根據劉羨冰的研究，澳門接受西方文化思潮影響多，私塾教學除傳統中國文史外，也加入西式課程設計，如1874年廖朗山創辦的「鏡湖義學」已引進西方知識。參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頁9、99。
- 23 據洗玉清回憶，啟明學校「力主趨新，教員多留日學生，課程中有物理、化學、體操、唱歌、倫理、生理等，於灌根學校外又別樹一幟。」洗玉清，〈澳門與維新運動〉，收入廣東省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校初步建立新世界觀；然而，真正建構她知識體系、教育理念、地方意識與民族主義激情的，則是廣東維新教育家陳子褒在 1899 年創辦的灌根學校。陳子褒與康有為（1858-1967）是同榜進士，曾是康有為萬木草堂（1891）的門生，曾參與公車上書。1895 年戊戌政變失敗後，陳子褒流亡日本，考察日本小學教科書及報刊如何以「淺說」、「條理」的方式普及國民識字率，激發教育救國的理念。²⁴ 滯留日本期間，陳子褒深切體悟救國之要在基礎教育，「以為諸賢皆眼光向上，而忽根本之圖，徒勞而無功，遂決變計，歸而設學於澳門。」²⁵ 於是創辦灌根學校，自號「婦孺之僕」，將嶺南地區兒童與女子教育視為救國之根本。灌根草堂繼承萬木草堂精神，提出澈底根除中國八股教育弊端的方法。實際辦學時，綜合英美、日本小學教育，以及中國科舉制度建立前，由簡而繁的教育方法，從體制上著手改革。分立小學、中學制，讓學生能按部就班，逐步培養學習興趣。²⁶

1912 年冼玉清從中學普通科畢業，根據畢業證書標明「本塾中學普通科畢業」，可以看出彼時學校制度設計確實

卷 6，頁 619。

- 24 陳子褒在《教育遺議》中描述考察日本現代教育帶給他的啟蒙，如何激發他的愛國主義：「愈恍然於中國教育既失其本，復遺其末，非全行改革，無以激發國民之志氣，濬淪國民之智慧，且讀書十年，毫無級數，淹沒靈性，虛度日晷，莫此為甚。」陳子褒，《教育遺議》（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73），頁 19-20。
- 25 編者，〈陳子褒先生行略〉，收入陳子褒，《教育遺議》，頁 4。
- 26 陳子褒辦學資料綜合參考陳子褒，《教育遺議》，頁 1-6；冼玉清，〈改良教育前驅者——陳子褒先生〉，收入陳子褒，《教育遺議》，頁 293-298；陳樹榮，《陳子褒與澳門》（澳門：君亮堂出版社，2013），頁 2-23。

依陳子褒的理念建制。冼玉清就讀灌根學校期間，陳子褒使用自編新式教科書，以方言教育和婦孺教育聞名嶺南地區，甚至在 1903 年率先招收女學生，成為中國第一間男女合校。灌根學校主張女性受教權與參政權，其教育實踐放在全國都具有先驅性，在嶺南地區成功培養出一批熱衷參與社會運動的新女性。冼玉清雖然並沒有積極表達政治主張，但是，她在學時就已經展現出議論能力，陳子褒戮力栽培，深刻影響她的知識建構與人生抉擇，甚至讓她對教育產生宗教情懷般的信念。²⁷

冼玉清除了成為少數沒有出國留學，就能在高等院校文史領域取得成就的民國女性學者，她還擔任過許多纂修廣東文史的公職。1927 年，嶺南大學首任華人校長鍾榮光，力聘年僅 32 歲的冼玉清出任嶺大博物館館長，她一直到 1949 年才卸任。鍾榮光曾在澳門辦學，與陳子褒交情甚篤，從這裡也能夠看到澳門給予冼玉清的資源。自此以後，她陸續擔任整理嶺南史的重要職務，包括廣東省文獻委員會、廣州文物保管委員會、廣東文獻館廣東文物編印委員會委員等。冼玉清在任內因能廣閱歷史材料，完成大量嶺南文獻學著作。²⁸ 如：《廣東女子藝文考》完成於 1938 年，1941 年由商務印

27 參陸鍵東，〈一個女子與一個時代〉，《純文學》，復刊第 2 期（1998 年 6 月），頁 16-18。陳樹榮，《冼玉清與澳門》，頁 38-41。黃柏軍，〈冼玉清教授與《陳子褒先生教育遺議》〉，《濠鏡》，總第 27 期（2018 年 12 月），頁 132-140。

28 黃任潮認為，冼玉清擔任嶺大博物館館長 25 年期間，使她在學術研究上獲得許多便利。同時，透過鍾榮光引薦，冼玉清也認識許多專家、遺老，如葉恭綽、龍榆生、冒廣生、張蔭棠等人，使她的學術積累日益豐碩，終於自成一家。黃任潮，〈冼玉清教授傳略〉，收入丁身尊主編，《廣東文史資料》，輯 64，頁 24。

書館出版，奠定嶺南婦女研究路線。還有系統性論著《粵東印譜考》（1935）、《廣東釋道考》、《廣東藝文志題解》，嶺南畫派畫家書畫研究〈元·趙松雪（1254-1322）〉、〈元·管仲姬之書畫〉，繼承南朝謝赫以來品畫傳統的〈招子庸研究〉等。冼玉清能綜合正史、筆記、詩詞材料，並大量使用廣東舊方志，成為她的研究特色，²⁹ 也是較早在廣東文史研究中關注澳門的學者。

值得注意的是，冼玉清雖然以嶺南文史專家與古典詩詞人身份，順利在廣東文化場域取得成就。但是，1950年代初大學院系調整以後，教學與科研開始向蘇聯學習，並呼應全國批判胡風、胡適、俞平伯政治文藝思想，在校內展開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運動。³⁰ 此時，仍堅守樸學治史、舊體詩文創作的冼玉清，與知交陳寅恪（1890-1969）被視為「臭味相投」的封建守舊派。³¹ 1952年整肅高教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她在〈檢討我的治學與教學〉報告裡，如此「反省」自己的封建保守思想：「我嚮往『賢人君子』的人格，我講舊道德、舊禮教、舊文學。講話常引經據典，強調

29 劉正剛，〈冼玉清與廣東方志資料的運用〉，收入徐爽編，《冼玉清研究紀念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頁226-228。

30 1954年中山大學開展科學研究工作十個新方向中，有四項顯然與冼玉清的教學、研究方向不合：一、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二、用蘇聯科學理論探討科學上的問題；三、編寫專書或接受高教部研究教學中未解決的關鍵問題；四、結合到工廠與農業生產合作社蒐集教學材料，研究中國過渡時期政治、經濟理論。吳定宇主編，《中山大學校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頁261-267。

31 陳寅恪1949年南下嶺南大學任教，與冼玉清成為至交。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提到冼玉清與陳寅恪的交情數次被中山大學形容為「臭味相投」、「封建落後、思想極為保守」。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臺北縣：聯經，1997），頁48。

每國都有其民族特點、文化背景與歷史遺傳，如毀棄自己的文化，其禍害不啻於亡國。」³² 從避免被打為右派的「自我檢討」報告中，看得出冼玉清隱約感覺自己已經不合時宜。特別是陳子褒培育她成為「賢人君子」的儒者人格，以及主張透過歷史教育來救國。這些在清末被視為革新的理念，又一次政權轉換後，反而成為應該被改造的保守思想。

雖然 1952 年思想改造運動嶺南大學「人人過關」，但長年刊登冼玉清研究的《嶺南學報》同一年停刊，直到 1963 年，《中山大學學報》才又刊載冼玉清的學術論文。20 年間，冼玉清多半撰寫短文，發表在香港、廣東的報刊雜誌上。其中一些廣東歷史掌故與未刊稿，1965 年由香港商務印書館集結為《廣東文獻叢談》，是一本較少被注意，實則行文引人入勝且史料豐富的嶺南文史著作。在此之前，她已經多年未有專書在中國正式出版，加之冼玉清因頻繁到香港銀行收父親遺產利息，被人誣告往香港送情報，必須寫下「坦白書」，她的港澳背景在此時成為問題。³³ 最後被迫從中山大學退休，甚至必須在一個月內遷出在校內居住一輩子的碧琅玕館，對她打擊甚大。³⁴ 雖然隔年冼玉清被任命為廣東省政協

32 冼玉清，〈檢討我的治學與教學〉（未刊稿，1958 年），轉引陸鍵東〈一個女子與一個時代〉，《純文學》，復刊第 2 期（1998 年 6 月），頁 102。

33 社潮，〈精緻溫潤的人生〉，《決策與信息》，期 340（2013 年 3 月），頁 64。

34 在陸鍵東的考察中，他直指冼玉清被迫退休。黃任潮則說明冼玉清原先考慮退休後，獨身女性到校外居住不方便，且有許多著作需要整理出版，對於退休與否感到遲疑。但是，考慮到自己與港澳有關係，舊同事如簡又文、羅香林到香港大學任教，為避免誤會，才同意退休。參黃任潮，〈冼玉清教授傳略〉，收入丁身尊主編，《廣東文史資料》，

常委、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但是，政協常委的位置，以及成立於 1953 年以「敬老崇文」為宗旨的廣東文史館，是官方暫時安置舊知識分子的閒職。可以想見視教育為一生志業的冼玉清，晚年有志難伸的鬱悶。

因此，再看 1958 年反右整風後的「自我交心檢查運動」報告書中，她又一次為守「舊道德」的儒者人格辯解，便能發現冼玉清深切感受獨立知識分子在新政策下諸多適應不良：「『言論自由，處士橫議』，是舊名士的習慣。我覺得說說怪話，發發牢騷，寫寫歪詩，事實有之，反黨則絕無此心。一生讀線裝書的人，是安分守常，不會造反的，希望黨相信他們多一點。」³⁵ 為了響應 1957 年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中山大學從 1957 年開始就風聲鶴唳，錯劃 193 名右派分子，進入整改階段後，高級知識分子被批判鬥爭人數高達 13.8%。1958 年中文系反轉原先五比一的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課程比例，並開出如毛主席延安座談講話、毛主席詩詞研究等新課程。³⁶ 陸鍵東指出，在同一份報告中，冼玉清必須為她在 1956 年隨廣東省人大與政協小組視察廣

輯 64，頁 28。但是，從玉華、陳卓主編的《民國風度》則指出，中山大學借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與胡風反革命集團，用思想保守、不願意參加政治學習為理由，將冼玉清歸入整編之列，強迫她一個月內辦好退休手續並搬出校園。從玉華、陳卓主編，《民國風度》（北京：中國計量出版社，2017），頁 331。綜合前述，五 0 年代時，冼玉清的港澳背景，確實使她的政治立場受到懷疑，以至於必須透過實際行動如捐款、拒絕返澳或接任香港教職來證明自己沒有反黨之心。

35 冼玉清，〈自我交心檢查運動報告〉（未刊稿，1958 年），轉引陸鍵東，〈一個女子與一個時代〉，《純文學》，復刊第 2 期（1998 年 6 月），頁 106。

36 參吳定宇主編，《中山大學校史》，頁 272-276。

東地區落實高等知識分子政策後，寫下的組詩〈潮梅視察十二首〉辯解，說明賦詩針砭黨群、政治學習考試與人事科、黨支部領導等問題只是紀錄沿途所得實況，希望反映人民意見，並非諷刺實事。³⁷

雖然洗玉清在 1950 年代被視為封建守舊人士，也很少如民國新女性一樣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但是，她受陳子褒推廣方言教育的地方意識影響，終身投入嶺南文獻工作與歷史教育，治地方史以報國。就連中日戰爭期間，洗玉清也沒有放棄史學家與教育者的職責。1938 年嶺大因日軍進犯而疏散，她先返澳避難，一個月後嶺大在香港復課，她又毅然赴港任教，並積極籌備中國文化協進會舉辦的「廣東文物展覽」，轟動一時，編纂圖文並茂《廣東文物》十卷。1942 年日軍進佔香港，洗玉清在動亂中乘船返澳避難，7 月，受校長李應林請託，至曲江嶺大復校任職。她不顧家人反對，從廣州灣深入粵北。洗玉清在戰時的行動，包括竭力保存廣東文獻，以及數次離開家鄉澳門，追隨嶺大復校，隱含她的民族主義激情。此外，據洗玉清學生黃天驥（1935-）回憶，洗玉清在「政治學習」時一向不慷慨陳詞，也不熟悉政治術語、蘇歐文藝理論用語，她堅持紮實考證與爬梳古籍的研究路數，顯然跟不上政治與時代。但是，抗美援朝期間，洗玉清將準備買房的巨額存款全數捐給國家，以不違背學術自由為基礎，低調實踐她的政治行動。³⁸

37 陸鍵東，〈一個女子與一個時代〉，《純文學》，復刊第 2 期（1998 年 6 月），頁 104-106。

38 黃天驥，〈一粒蓮子一片冰心——懷念洗玉清教授〉，收入黃天驥著，《黃天驥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冊 13，頁 146-147。

值得注意的是，冼玉清談知識分子職責時，並不常標誌女性發言位置。但是，冼玉清相關研究與評論，卻都特別凸顯她的女性身分，例如：稱讚其愛國主義與高風亮節時，強調這種風骨對一介弱女子不容易。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稱冼玉清被世俗社會視為為「怪」女性。一方面因她是「20世紀廣東不可多得的女學者與詩人，對嶺南歷史、風物、史志文物的發掘與整理，數百年間嶺南巾幗無人能出其右。」³⁹。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她青年時期就「立志終身從事教育，犧牲個人幸福，以為人群謀幸福。」⁴⁰ 秦牧稱「一位女學人有相當地位，而又一直沒有結婚，在任何社會都會引起人們背後的許多議論，自是不言而喻的。」⁴¹ 從不同作者的討論中，可以看到冼玉清身上具備傳統才女或民國新女性的不同面向。可見她作為一位在學術場域成功取得成就的知識女性，身上矛盾又複雜的性別特質，以及獨特的生命動態，使評論者難以一錘定音地給予單一評價。

二、教職、婦職難兩全： 嶺南知識女性的抉擇困境

冼玉清開創嶺南婦女史研究，很早就決意終生不婚，以「殉學」的態度獻身嶺南歷史教育與學術，在彼時被視為行

39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頁41。

40 冼玉清，〈檢討我的封建保守思想〉，轉引自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頁43。

41 秦牧，〈關於嶺南女詩人冼玉清〉，收入佛山大學文史研究室、廣東省文史館編，《冼玉清文集》，頁2。

事特殊的女性；另一方面，卻又因為治學風格與外在形象，1949年共產政權成立以後，逐漸被視為追不上新時代的傳統守舊才女。婚姻與志業不兩立的選擇，及其新、舊女性形象顯露的複雜生命樣態，過去很少從澳門女子教育給予她的影響來詮釋，此外，也應該從其婦女史研究成果來定位她在廣東學術場域的位置。本文認為，從冼玉清嶺南研究重層視域的特色來看，《教育遺議》中收錄她對陳子褒在澳門、香港、廣東宣揚女學教育的評注，雖然零碎，卻可以作為分析她在民初被視為新女性的思想資源。此外，冼玉清著名的文獻學著作《廣東女子藝文考》，是婦女史研究者經常引用的材料，雖然魏愛蓮〈重拾過往——1636年至1941年間的女性編者與女性詩歌〉與胡倩〈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價值三論〉已經指出該書的史學貢獻。不過，誠如胡曉真所言，牽涉地域研究的清代婦女史，注意力多半集中於江南地區，《廣東女子藝文考》幾乎是唯一例外，應多探索江南以外地區女作家。⁴² 由於冼玉清自身亦是嶺南女作家，本文將從新、舊女性形象與地域文化切入，與她的生命經驗交叉分析。

《廣東女子藝文考》1941年出版後，「一舉奠定了冼玉清在嶺南歷史上編寫女性著作目錄的第一人的地位」，接下來一系列針對嶺南婦女史的考證，更使她成為「廣東女性研究這一學術脈絡的開創者」。⁴³ 魏愛蓮認為該書挑戰過去認

42 胡曉真於2005年已有考察，於此20年間，清代婦女史學者對於其他地區的女作家，如福建、湖州、貴州等地已經有了關注。不過，廣東女作家仍舊較為缺乏討論。胡曉真，〈藝文生命與身體政治——清代婦女文學史研究趨勢與展望〉，《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13（2005年12月），頁27-63。

43 參喬玉紅，〈冼玉清與嶺南女性及文化研究〉，《山西師範大學學報》

為 18 世紀江南女性文學活動衰落的論述。對於洗玉清的史學貢獻，學者多半會突出她的女性身分，如盧瑋鑾在〈讀洗玉清〉中，形容洗玉清沈實的考據分析與史料蒐集功力，女界少見；⁴⁴ 鄭焯明更在〈讀洗玉清教授著作筆記〉中明述她為「身分異常獨立的女學者、女詩人」，身處「對婦女限制極大極多的末代舊中國」能「超越傳統」。⁴⁵ 究竟洗玉清在當時如何在考據學上成就「女界少見」，新舊文化兼容的特色？又在身分上如何顯現對傳統的超越？本文認為，陳子褒給她關鍵性的思想啓蒙，是一條值得關注的重要線索。但是，另一方面，洗玉清在嶺南婦女史研究中呈現的知識建構模式，是否能超越男性觀點？亦是值得思索的問題。

首先，洗玉清相關研究，幾乎都提到她 17 歲決定終生不嫁，宣示未來將「以事業為丈夫，以學校為家庭，以學生為兒女」。她將教育視為終生志業，除了在 1952 年〈檢討我的治學與教學〉中自陳犧牲個人幸福以成就教師責任，1958 年〈自傳〉裡她更進一步闡述為教育獻身的原因，以及陳子褒對她的決定性影響：

我一生受他的影響最深，也立意救中國，也立意委身教育，自己又以為一有室家，則家庭兒女瑣務，總不免分心。想全心全意作人民的好教師，難免有失良母賢妻之職，想做賢妻良母，就不免失人民教師之職，二者不可兼，所以十六七歲我就決意獨身不嫁。……

（社會科學版），卷 40 期 3（2013 年 5 月），頁 134-137。

44 盧瑋鑾，〈讀洗玉清〉，收入盧瑋鑾著，《盧瑋鑾文編年選輯（1998-2019·浴火鳳凰）》（香港：三聯書店，2019），頁 19。

45 鄭焯明，〈讀洗玉清教授著作筆記〉，收入陳樹榮主編，《洗玉清誕生百年紀念集》，頁 77-78。

在灌根學校讀書七年，老師特別用心教我，我也成績特別好，所以童年時頗有文名。⁴⁶

洗玉清的感情世界遭人猜測議論，這是她經常被形容為超越傳統的原因之一。20世紀前女性多因廢疾或以出家、孝親、慕清為由，保持獨身狀態，⁴⁷與洗玉清標舉為教育、救國宣示不婚的姿態不同。據游鑑明觀察，20世紀前半期，特別是新文化運動後女性獨身言論成為受矚目的問題，洗玉清的選擇置入當時語境，必定面對不少非議。

當然，洗玉清不婚並非孤例，胡曉真論清代女性彈詞小說，從文本內外挖掘獨身女性多元的自我實現，這些文學中的不婚想像，「其實可以讓我們體察 17 到 19 世紀間女性自我意識發展的一個特殊方向，到了 20 世紀初，這一思考的理路將更清晰」。⁴⁸而民初開始湧現婦女組織「不嫁會」的

46 洗玉清，〈自傳〉（未刊稿），轉引陳樹榮，《洗玉清與澳門》，頁 38。

47 游鑑明對中國女性獨身言論，以及社會觀感有歷時性的考察，提出 20 世紀前半期知識女性獨身主義比例雖然不高，但獨身言論或獨身現象遭受不少負面批評。游鑑明，〈千山我獨行？廿世紀前半期中國有關女性獨身的言論〉，《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9（2001 年 8 月），頁 121-187。

48 胡曉真，〈酗酒、瘋癲與獨身——清代女性彈詞小說中的極端女性人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期 28（2006 年 3 月），頁 75。胡曉真在文中深入分析清代女性彈詞小說中「極端女性人物」之一的「獨身的女兒」之人物選擇與意志，可視為清代才女在文學中以獨身想像隱含女性面對婦職與自我實現之間矛盾與掙扎。既有《夢影緣》集體殉道式的女性人物獨身選擇，也有《金魚緣》、《榴花夢》分別以終身扮裝以及盡「婦職」後才決定離開家庭的實踐獨身主義方式。另外，《金魚緣》作者孫德英，就是有意識地選擇終身不婚，胡曉真進一步指出，女性彈詞小說家創作期間經常是處於「廣義的獨身狀態中」。

短暫行動，卻也同時在媒體上引起破壞婚姻制度的爭議。⁴⁹由於洗玉清未曾公開提出女權論述，直到1958年〈自傳〉才算以文字公開表態獨身宣言，因此較少在晚清民國女性獨身主義與女性書寫論中被提及。若與時代相近、同樣選擇獨身的呂碧城（1883-1943）並置，顯然呂碧城鮮明的新式知識女性形象，使她成為民國新女性代表性人物。⁵⁰洗玉清著長旗袍、埋首史料堆的樣子，便顯得保守許多。⁵¹她的嶺南研

49 胡曉真提醒，文學雖然不能視為現實的機械性鏡映，但具有與現實往復駁雜的關係。因此，女性彈詞小說創作者在作品中表達的獨身想像，到了二十世紀初在中國社會確實形成一股以不嫁爭取自由的風潮：1916年南京率先組織「不嫁會」，1917年江蘇成立「立志不嫁會」，1919年上海出現「女子不婚俱樂部」。胡曉真，〈酗酒、瘋癲與獨身〉，《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期28，頁76-77。

50 呂碧城新式知識女性身分鮮明，包括與舅父決裂以後隻身離家求學，情感經歷與不婚選擇，以及積極擔任《大公報》編輯、主持天津女學堂八年（1904-1912）、遊歷歐美又經商致富，並大量撰寫專注女界革命的「女界新文體」論述，提倡女權。參呂碧城，〈論提倡女學之宗旨〉、〈北洋女子公學同學錄序〉，收入劉納編著，《呂碧城》（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頁135-138、141-142。羅秀美，〈自我、空間與文化主體的流動／認同——以女詞人呂碧城（1883-1943）的散文為範圍〉，《興大中文學報》，期32（2012年12月），頁163-210。黃媽梨，〈呂碧城與清末民初婦女教育〉，收入黃媽梨著，《妝臺與妝臺以外——中國婦女研究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頁122-140。方秀潔，〈重塑時空與主體：呂碧城《游廬瑣記》〉，收入張宏生、錢南秀編，《中國文學：傳統與現代的對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393-413。

51 黃天驥回憶洗玉清在嶺大教書時，長年穿的是淺花色、純藍色長旗袍，旗袍剪裁也並不講究線條，與當時女性流行的連衣裙、列寧裝、襯衣長褲短外套相當不同。因此，黃天驥形容她的打扮在當時看起來「有點特別」。顯然，洗玉清的形象在年輕學生眼裡，與新式女性知識分子不符。參黃天驥，〈一粒蓮子一片冰心〉，《黃天驥文集》，冊13頁143。

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更被視為「守舊的『白專』典型」。⁵² 陸鍵東評價冼玉清即使生命跌宕有個性，但她的文化定位難脫「傳統學人」。⁵³ 不過，呂碧城雖作風前衛，卻和冼玉清同樣在新文學運動風潮中，持續創作舊文學。此外，李又寧即使將呂碧城定位為進步女性，卻批評她欠缺秋瑾為國犧牲的精神，無法做出更大貢獻。⁵⁴ 然而，中國女權運動特殊歷史時刻，⁵⁵ 什麼才是「女性知識分子典範」？或許應該從個人生命與情性，同情理解個別行動者的選擇。傳統才女在面對「新女性」形象確立過程中進行的自我轉化，過去已經受到學界關注。值得一提的是，胡曉真針對三位不同典型的女性教育家的研究中，提醒研究者從個人生命史進入，複雜化傳統與現代分野，能更深刻理解清末民初女性的抉擇。⁵⁶ 從冼玉清在 1950 年代檢討報告書中被迫「反思」治學與性別意識的「舊觀念」來看，新舊文化之間的張力在

52 黃天驥，〈一粒蓮子一片冰心〉，《黃天驥文集》，冊 13，頁 147-148。

53 陸鍵東，〈一個女子與一個時代〉，《純文學》，復刊第 2 期（1998 年 6 月），頁 19。

54 參李又寧，〈呂碧城生平〉，收入李又寧著，《近代中華婦女自敘詩文選》（臺北縣：聯經，1980），輯 1，頁 192。

55 劉人鵬曾以批判性視角分析晚清以來富國強種框架中的男女平等論。認為其「承襲了階序格局裡知識分子聖王說話主體，必須以一種由上到下的勢力，以一種介入或殖民的方式，改變婦女的生存，建立新的兩性關係」。此外，論者要破除的封建體系性別倫理、階層與壓迫，被涵蓋進國族主義現代化過程中，生產出來不平衡二元價值階序，與「西方」文明相對的「進步——落後」階序價值下。劉人鵬，《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政治》（臺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頁 71-72。

56 胡曉真，〈杏壇與文壇——清末民初女性在傳統與現代抉擇情境下的教育與文學志業〉，《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5（2007 年 12 月），頁 35-75。

兩次政權轉移之間，始終作用於她的生命裡。洗玉清提及她在澳門、香港殖民社會生活，教會大學環境已經讓她習慣紳士禮讓女性的「歐美生活方式」，顯然相較於左派女性激越的革命形象，她是遠遠「不夠進步」。⁵⁷ 如此一來，洗玉清矛盾就在於舊時代顯得標新立異，新時代中又不夠前衛。⁵⁸

為何對洗玉清而言，婦職與教職必然扞格？本文認為是受陳子褒教育理念影響。首先，從性別史角度來看，洗玉清於 1941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教育雜誌》發表〈改良教育前驅者——陳子褒先生〉一文，已經凸顯灌根學校在澳門創辦的意義，指出陳子褒女權思想比萬木草堂更鮮明，放在全中國都具先鋒性，只是沉潛邊陲辦學而被忽略。如：1895 年專

57 洗玉清在兩次思想審查運動中，對於治學方法與性別意識兩方面，都表達過共產中國成立以後，自己的「舊思想」身處於新時代中，諸多不適應的「反思」。例如：1952 年思想改造運動，形容自己流連古蹟之間，發思古之幽情是「封建保守思想」。洗玉清，〈檢討我的封建保守思想〉，轉引自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頁 47。又如：1958 年「自我交心檢查運動」中，洗玉清在報告書中寫到：「歐美生活方式，是尊重女性，嶺南大學也有這個傳統，無論行路座位，都講 Lady first。解放後無人注意此，我是不習慣的。」1949 年以後女性在會議中也如男性一樣高舉拳頭、呼喊口號，劍拔弩張的氣氛使她不順眼。洗玉清，〈自我交心檢查運動報告〉，（未刊稿，1958 年），轉引陸鍵東，〈一個女子與一個時代〉，《純文學》，復刊第 2 期（1998 年 6 月），頁 20。

58 連玲玲曾提醒五四用新舊二分框架來理解婦女，是忽略女性特質的動態變化。若用胡適對新女性的定義，洗玉清雖然人格、經濟、婚姻獨立，但言論並沒有趨於極端，且依禮法行事。然而，若依文中舉張希遠對舊婦女的定義，洗玉清又不符合「依賴心重」、「判斷力缺少」。因此，本文也希望從洗玉清個人生命史與知識養成的多面性，提供新、舊混雜的女性形貌。參連玲玲，〈走過五四：反傳統風潮下的知識婦女與婦女知識〉，《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33（2019 年 6 月），頁 i-vii。

門編給女性、兒童的教科書《婦孺須知》，是中國行世最早的白話文教科書；灌根學校改制為男女合校的時間，比政府頒訂承認男女同享受教權的《新學制令》還要早 19 年。⁵⁹ 在洗玉清論述陳子褒女權教育貢獻前，澳門婦女改革運動恐怕絕少被看見，直至今日，澳門婦女研究仍十分缺乏。廖子馨在〈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中，特意提及陳子褒戊戌變法失敗後，有機會開辦首間男女合授學校，也是在葡萄牙殖民政府認同的基礎上，成功推行婦孺教育改革。⁶⁰ 雖然早期澳門教育百花齊放，加之傳教士很早就在澳門、香港創造女學盛行的環境，然而，從澳門教育史角度看，正是因為 1887 年《中葡北京條約》簽署後，殖民政府缺乏統一教育方針，教育政策以葡人與土生葡人為主，華人教育則由華人自行辦理。⁶¹ 如此一來，澳門華人的邊緣性，反而提供洗玉清接觸新式女性教育的開闊空間。

59 洗玉清，〈改良教育前驅者〉，收入陳子褒，《教育遺議》，頁 293。

60 據李蘭萍《辛亥革命與廣東婦女》對辛亥革命前女子教育的研究，1834 年，倫敦婦女會議提倡在遠東設立女學，英國教士 Mrs. Gutglaf 便首先在澳門設立女塾，同一時期，許多歐美教會紛紛到香港、澳門設立女學，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條，宣傳男女平等，強烈抨擊中國婦女地位低下的問題。此外，廖子馨也指出澳門較早接觸歐洲思想，婦女思想解放早於中國內陸。20 世紀初詩社雪社，就有男性成員作詩恭賀女性成員剪髮，表示先進；社長詩作中也描述女性裝扮成男性西式裝髮。李蘭萍，《辛亥革命與廣東婦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頁 62-96。廖子馨，《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1994），頁 14-15。

61 黃鴻釗《澳門簡史》、馮邦彥《葡國撤退前的澳門》皆指出澳門教育特點為辦學多元，多種學制同時存在。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葡萄牙澳門政府並不關注華人教育，所以缺乏統一教育政策。有關澳門教育史研究述略，本文參考鄭潤培，〈澳門教育史研究述略〉，張偉保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頁 20-21。

洗玉清等人曾經編纂、評註陳子褒教育論述——《教育遺議》，1952 年在香港出版。其中，收錄諸多論婦女受教權與女教師職責的文章，為嶺南婦女教育改革提供珍貴的歷史材料。本文認為，從洗玉清作為編輯與評論的角色，分析《教育遺議》中選錄女子教育文章，能夠說明灌根學校對她的獨身主義造成深遠影響。綜合來看，在教學方法上，為了教導婦孺識字，陳子褒特別注意培養學習動機，企圖讓學生從認字建構傳統與現代融合的世界觀。他更在 1900 年率先出版一系列婦女、兒童基礎教科書，實際應用在教育現場，並迅速在嶺南地區廣泛傳播，影響力不限於澳門，在嶺南地區培育數千位男女學生。⁶² 其中，陳子褒確實特意栽培女學生，1906 年，洗玉清 11 歲時入灌根學校，1909 年陳子褒編印《女生文編》，一口氣選錄五篇洗玉清在學期間撰寫的文章。洗玉清提及陳子褒為文編作序時寫下：「謂造物生材，靡可畛域，女子之可造者，未嘗遜男子一籌」。⁶³ 可以判斷，陳子褒特意栽培女學生，發展出不遜於男學生的議論能力。在灌根學校培養學生策論以救國的脈絡中，日後洗玉清治地

62 參〈陳子褒先生墓碑〉，收入陳子褒，《教育遺議》，頁 6。該文記載他設帳澳門，晚居香江，前後男女學生數千人。在辦學期間，他親自編寫基礎教育教科書，包括《婦孺三字書》、《婦孺四字書》、《婦孺五字書》、《婦孺新讀本》、《婦孺論說入門》、《婦孺女兒三字書》等。他以《婦孺三字經》代替《三字經》，內容全用白話，如：「早起身，下床去；先灑水，後掃地」之類；以《婦孺四字書》代替《千字文》；以《婦孺五字書》代替《幼學詩》。這些白話課本，很快就傳入內地，在廣州、佛山等地大量印行，影響深廣。陳子褒用於教學的這些讀本，是中國最早的白話文教科書，在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63 洗玉清，〈改良教育前驅者〉，收入陳子褒，《教育遺議》，頁 295。

方史時，隱含民族主義信念，由此可見端倪。

據洗玉清為《教育遺議》撰寫後記〈改良教育前驅者〉來看，陳子褒在廣州就有辦理蒙學的經驗。於澳門創立學校以後，⁶⁴ 貫徹康有為強化幼學以開發民智的教育理念，並將他在廣東、日本所接受基礎教育改革思維帶進澳門，《婦孺須知》就是在康有為門下編纂。在清末民初女權思想改革與推動進程中，維新派是較早將婦女受教育、戒纏足主張連繫起來的組織，⁶⁵ 不過，陳子褒才是真正落實到基礎教育的改革者。嶺南大學教授楊壽昌（1866-1938）生前為《教育遺議》撰寫〈陳子褒先生遺集序〉，就指出清末知識分子學問與聲望愈高者，多致力中學以上教育，唯陳子褒不同於康門子弟，能篤實勤樸專心於小學教育，在全國倡議，才培養出如洗玉清這樣「以名德長才，有聲於時」的女性知識分子。⁶⁶ 洗玉清進一步在後記論述灌根學校與康有為教育理念的差異，其中有：一、率先提倡教育應為男女共享之權利。二、主張小學校育權歸於女性。三、提倡寡婦再嫁權。陳子褒並於 1902 年作文課中要求學生以此為題議論，大膽挑戰社會認知。⁶⁷ 她認為男女合授的革新意義在於，無論灌根學校學

64 陳子褒 1899 年遷居澳門，以教師身分受鄧氏聘僱於荷蘭園第三號。1900 庚子年自立門戶，同樣在荷蘭園創辦「蒙書學塾」。參陳樹榮，《陳子褒與澳門》，頁 22。

65 孫桂燕，《清末民初女權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頁 72-81。

66 參楊壽昌，〈陳子褒先生遺集序〉，收入陳子褒，《教育遺議》，頁 2-3。

67 陳子褒倡議寡婦再嫁的論述〈曹大家七誠書後〉，收錄於《教育遺議》，區朗若按：「在當日之社會，可謂石破天驚之論」。陳子褒，〈曹大家七誠書後〉，《教育遺議》，頁 112-116。洗玉清摘錄陳子褒文章中

制與《教育遺議》所錄之論述，都是從根本上主張女性智識與男性相等。因此，當全中國尚以西方傳教士成立的女子學堂來教育女性，即使教授應用文字、書算物理，也是爲了盡婦職之道的情況下，灌根學校反對優先教導刺繡等美術，積極讓女性受高等教育，才能真正栽培投入公領域的女性知識分子。洗玉清在〈澳門與維新運動〉一文，就提到辛亥革命充敢死隊的女隊員許劍魂、梁綺川，都是陳子褒培育出來的學生。⁶⁸ 此外，在澳門創辦粵華中學的著名女性教育家廖奉基（1894-1957），亦是灌根學校栽培的教育人才。

《教育遺議》的編纂呈現出陳子褒對女子教育的貢獻，在於提出女性受教權與施教權在救國的意義上同等重要；同時，也暗示婚姻與教育之間的扞格。首先，他主張基礎語文教育是造就男女平等智識的關鍵：

行新法教授，編七級字課、小學釋詞、諸史小識等書，蓋務求語文之溝合，使學齡兒童，更無不通國文之患。又以學校教育，必本於家庭，而婦女不識字者居多數，亟倡女學，期造就平等智識。凡苦心經營，關於婦孺尤至。⁶⁹

〈教育女子論〉則倡議進一步給予女性參政權：

新官紳之為女子計畫也，亦云周矣。買婢則禁之，蓄

提到于姓學生斷然輟筆，不願答題，可見倡議寡婦再嫁與當時社會風氣相違。陳子褒非常早就透過歷史考證，議論古代社會並不輕視寡婦再嫁，洗玉清亦認為是思想革命家之論。洗玉清，〈改良教育前驅者〉，收入陳子褒，《教育遺議》，頁295。

68 洗玉清，〈澳門與維新運動〉，《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卷6，頁620。

69 編者，〈陳子褒先生行略〉，收入陳子褒，《教育遺議》，頁4。

妾則懲之，參政權則與之。獨此平等教育則遭同樵鹿。⁷⁰

女性除了參政救國以外，投身教育也是立國根本。冼玉清提醒讀者，應注意陳子褒寫於 1912 年〈論女生四特性〉一文的重要性，他在教育現場觀察女學生潛力：

鄙人設教澳門，男女同學，十年於茲矣。女生人數，平均佔三分之一。而算學文學，時過男生。乃近日悉心研究，以道德論，女子亦有特性焉。⁷¹

列舉女性優於男性的四種德行：「勤、儉、潔、信」，指出中國敗與不敗繫於社會道德，因此教育家應注重女學，小學教育權應當歸於女子。按區朗若的註解，「此是當日先生教授下之女德」，顯示冼玉清所受之女德教育亦是如此。⁷² 陳子褒〈論女子初等小學之關係〉，更直指女性結婚以後，再難讀書進修的現實：「若女子適人，則有一大門限限之。更不待言。三日入廚後，幾見有為人媳婦而挾一冊書相率為啣唔佔畢乎。」⁷³ 冼玉清為此篇下的評論為「小學教育為一生學業基礎。故先生對小學師資再三致意。此事真不可忽也。」⁷⁴ 雖然沒有就婚姻與女性教育與學術的矛盾提出看法，但她同意女子小學教育與師資培訓為一生最重要基礎。對冼玉清而言，她從灌根學校認識女性教育者的責任「與社會道德之

70 陳子褒，〈教育女子論〉，收入陳子褒著，《教育遺議》，頁 109。

71 陳子褒，〈論女生四特性〉，收入陳子褒著，《教育遺議》，頁 110-111。

72 區朗若按，見陳子褒，《教育遺議》，頁 111。

73 陳子褒，〈論女子初等小學之關係〉，收入陳子褒著，《教育遺議》，頁 91。

74 冼玉清對陳子褒〈論女子初等小學之關係〉之編後語，見陳子褒，《教育遺議》，頁 92。

前途，關係匪淺」，在〈庇理羅士女師範演講〉一文註解中，讀者可以看到她承繼陳子褒教育為道德根本的理念：「玉清嘗謂教育乃神聖事業，倘不理會神聖事業之真義者，不可為教師，庶免自誤誤人也」⁷⁵。因此，回顧洗玉清認為婦職與教職不能兩全的緣由，可以置入此脈絡來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洗玉清帶有宗教情懷的殉學態度，也可以從《教育遺議》找到線索。陳子褒在〈聯愛女校招生啓〉觀察殖民地香港重英語教育，指出國學傳承應靠女性，形成獨特的國學教育主張：「男子趨重蟹行文字，本港尤甚。故欲存國學，必賴女子。」⁷⁶ 洗玉清在港女校讀英文，進入嶺大任教後又配合課程需求，負責用英語教二十四史，在教會學校環境她仍堅持以傳統樸學治嶺南文史，或許與陳子褒認為在殖民地社會興女學即興國學有關。值得注意的是，她在〈自傳〉中說自己「也立意救中國，也立意委身教育」，挪用女性婚嫁行為的語彙「委身」，說明她以恪盡婦職的概念來思考教育與救國的職責。一方面，可以說洗玉清在思想上並沒有突破傳統家庭性別分工。灌根學校培育出來的知名女性教育家廖奉基，在《美洲嶺南學校共進會報告書·嶺南女學》中，特別指出嶺南女學在新式教育與守舊人士間，開闢折衷道路，中、英語訓練皆重，為中國奠定良好家庭教育基礎的特色：

嶺南倡建女學之始，知女子有相夫教子之責，非得尋常中學之普通學識，無以明社會之種種事變，以相其

75 洗玉清對陳子褒〈庇理羅士女師範演講〉之註解，見陳子褒，《教育遺議》，頁194。

76 陳子褒，〈聯愛女校招生啟〉，收入陳子褒著，《教育遺議》，頁167。

夫，不知適宜之道、根要之學，以教其子，於是中學宜有之科，未嘗稍減。又知女子有持家之責，故特加入家政一科……。⁷⁷

雖然灌根學校對冼玉清知識養成、性別意識產生關鍵影響，不過，本文認為，陳子褒即使鼓勵女性遊歷歐美，傳承國學，與男性同樣涉獵經史子理文，他提供女性報國的藍圖，主要還是投身基礎教育。冼玉清於 1952 年說明出版《教育遺議》原因時，提醒讀者隨時間演變，陳子褒的思想或許未盡合適。⁷⁸ 因此，冼玉清自 1920 年代末，逐漸在廣東史學社群取得重要職務，並開創一系列嶺南女性考證，是真正關注女性自身的婦女知識建構，也超越陳子褒在清末想像知識女性能達到的位置。如 1938 年中日戰爭期間，冼玉清在香港任教時，於《嶺南週報》3 月 8 日「三八婦女特號」上發表〈民族女英雄冼夫人〉，是近代中國較早介紹粵西「南方女主」冼夫人的現代研究論著，⁷⁹ 雖然是普及性歷史掌

77 廖奉基，〈嶺南女學〉，收入美洲嶺南學校共進會，《美洲嶺南學校共進會報告書》（紐約：美洲嶺南學校共進會聯會，1918），頁 53-54。

78 參冼玉清，〈改良教育前驅者〉，收入陳子褒，《教育遺議》，頁 293。該文原為 1941 年刊於《教育雜誌》，1952 年出版《教育遺議》時，又改寫增補，收錄於書後，作為後記。

79 「南方女主」的指稱，乃援引自胡曉真，她以西南地區地方政治空間為半自治土司制度的特殊性，重思宮廷以外，特別是位處邊緣的西南地區女性執政者複雜的政治身分。其中，被尊為「嶺南聖母」的冼夫人，歷代非漢族形象的文學再現，與史料中和中央王朝關係演變。參胡曉真，〈據象鬪戰或騎象入京？——南方女主的譜系建構與其文學敘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38（2022 年 12 月），頁 1-61。冼玉清的文章更突出冼夫人在降敕書中「訓導子孫，敦崇禮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象徵歸化中央王朝的面向。根據廣東省民族研究學者練銘志〈關於冼夫人研究芻議〉考證，對於冼夫人的研究最早是清茂名縣譚應詳編《冼夫人全書》開始。不過該書已散佚，內容也不

故，卻重新定義古代婦女立德標準。文中突出洗夫人以女性統治者身分，在「天下分裂，民伐擾攘，民不聊生，竊名僭號，四分五裂」的梁陳之間，成為「宣諭國家德意」、「開幕府建牙」、「享萬民祭祀」第一人，將洗夫人定義為「烈丈夫」所不能為，折衝禦侮的「民族女英雄」。若參照洗玉清在中日戰爭期間的行動，可以看出她採取民族主義角度詮釋洗夫人，潛在的政治立場。1937年日軍飛機轟炸廣州後，10月，她加入廣東各大學教授聯合聲明，在一眾男學者中，極力呼籲歐美文化界制裁侵略者。⁸⁰ 接著，她又公開發表「婦女對募制寒衣之責任」播音演說並撰寫文章，積極為前線軍人募捐冬衣。⁸¹ 雖然洗玉清沒有加入政府婦女組織，但她積極鼓吹廣東女性以公民身分參與戰爭。因此，〈民族女英雄洗夫人〉可視為藉考洗夫人政治功績，對應同樣經歷分裂，需要政治家「折衝禦侮」的中國，隱含自身對性別與民族、家國的思考。後來，她又接連撰寫〈洗夫人非姓洗〉和〈樵國夫人叢考〉，突出嶺南地區邊緣女性統治者特殊性。⁸²

可考。因此，洗玉清在1938年寫成的這一篇〈民族女英雄洗夫人〉是目前中國現存最早研究洗夫人的文章。練銘志，〈關於洗夫人研究芻議〉，《嶺南文史》，期1（1984年4月），頁22-24。

80 1937年10月15日，廣東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國民大學、廣州大學等大學教授，如吳康、侯過、洪深、姚碧澄、尚仲衣、羅雄才等學者，皆電歐美文化界呼籲主持正義。其中，洗玉清為唯一女性學者。袁鍾仁，〈嶺南才女洗玉清〉，收入廣州市文史研究館編，《廣州的故事》，集2，頁262-263。

81 參〈嶺南才女洗玉清〉，收入佛山炎黃文化研究會、佛山市政協文體衛委員會編，《佛山歷史人物錄》（廣州：花城出版社，2004），頁415。

82 洗玉清，〈洗夫人非姓洗〉，收入洗玉清著，《廣東文獻叢談》（香港：中華書局，1965），頁63-65。有關洗玉清，〈樵國夫人叢考〉一

冼玉清最著名的婦女史研究，是廣泛考察廣東才女論著的《廣東女子藝文考》。她藉幾年來纂修省志的職務之便，以一己之力蒐整「一百零六種，作者凡百家」的廣東女性書寫，⁸³ 是目前最完整的選集。本文認為，與冼玉清生命史參照閱讀，《廣東女子藝文考》展現南方女性史學家最切身的生命關懷。魏愛蓮、胡倩都指出該書綜合運用多種材料，涵蓋範圍擴及全粵。徐紹縈序中稱讚：「觀其義例，詳晰謹嚴。循四部之次序，或存或佚，朗若列眉，又仿朱竹垞經義考例，節錄序跋，可知著述者之大概。」⁸⁴ 冼玉清將廣東才女納入中國傳統正史女傳書寫體例編寫。本文還注意到，除了活躍於廣東中心地區的才女，冼玉清考述詩人羅慧卿參加香港蓮社佳遊，詩集收錄澳門記遊詩多首，保留海南女作家流動於港澳之間的寫作狀態。除了閨秀常見的詩、文集外，她也特意在「史部」挖掘嶺南女性對史學感興趣的特殊傳統。

作為不婚的女性史學家與寫作者，冼玉清深刻地看見，廣東才女婚後，才華為日常家事消耗殆盡之困境，她在〈後序〉中申論：

學藝在乎功力。吾國女子，素尚早婚。十七八齡，即

文，《廣東文史資料》第64輯「冼玉清著作目錄」，載明該篇文稿為未發表但已成稿本。另據練銘志之研究，該未刊文稿存於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見練銘志，〈關於冼夫人研究芻議〉，《嶺南文史》，期1（1984年4月），頁22-24。

83 冼玉清於〈後序〉記載：「余年來纂修省志，博搜群書。婦女專集，輒有過眼。隨手編目，所積漸多。爰有廣東女子藝文考之作，計得書一百零六種，作者凡百家。」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41），收入孫曉梅主編，《中國近現代女性學術叢刊續編》（北京：線裝書局，2013），冊2，頁399。

84 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頁403。

為人婦。婚前尚為童稚，學業無成功之可言。既婚之後，則心力耗於事奉舅姑周旋戚黨者半。耗於料理米鹽，操作井臼者又半。耗於相助丈夫，撫育女子者又半。質言之，盡婦道者，鞠躬盡瘁於家事且日不暇給，何暇鑽研學藝哉？故編中遺集流傳者，多青年孀守之人……此輩大抵兒女累少，事簡意專。故常得從容暇豫，以從事筆墨也。至於弱年謝世者，遺集煌煌，又大都受乃父乃夫乃子之藻飾，此亦無可諱言者。⁸⁵

回顧她認為婦職與教職二者不可兼得的信念，那麼，《藝文考》暗示廣東才女若不為家事所累，所錄著作應更多，面向應該更廣，亦可視為洗玉清對嶺南才女處境同情共感。對應高彥頤論及家刻推動江南才女潮流，⁸⁶ 士大夫家庭培育女兒成具有文藝長才的女性，是為鞏固雙方家族在婚配時的文化資本。洗玉清的喟嘆，未嘗不是她對婚姻與知識分子寫作、救國，實難兩全的深切體會。而她在思想改造運動檢討報告中自陳研究取向：「我最同情自古忠心耿耿，而遭讒受冤屈之人，於是專找這些人的材料而為其表白。」⁸⁷ 雖然《廣東女子藝文考》所錄廣東才女沒有遭讒蒙冤，但是，從歷史材料中為有難言之隱的有志之士找到發聲位置，也是她治嶺南婦女史的精神。

然而，洗玉清也提出廣東才女成名，多數乃獲與家人唱和、刊刻的支持，不少男性文人為女性作品作序、跋，提攜

85 洗玉清，〈後序〉，《廣東女子藝文考》，頁401。

86 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40-41。

87 洗玉清，〈檢討我的治學與教學〉，轉引陸鍵東〈一個女子與一個時代〉，《純文學》，復刊第2期（1998年6月），頁102。

女作家，使其作品得以在地方傳播。胡倩論《廣東女子藝文考》女性研究價值時，指出冼玉清的考證讓廣東才女保守與改革的面向並存，顯示 18-19 世紀嶺南女性創作與傳統家庭之間的拉扯。⁸⁸ 參照陳東原「五四婦女史觀」代表作《中國婦女生活史》，出版於 1928 年，與《廣東女子藝文考》完成時間僅相差 10 年，體例、史觀卻大相逕庭。陳東原欲藉撰寫中國婦女被壓迫史，控訴舊道德、宗法等對女性的殘害，提倡社會主義「家務工作社會化」，批判清末賢妻良母主義，主張將婦女勞力從家庭中解放，期待刺激女性走向新生活。⁸⁹ 反而較晚出版的《廣東女子藝文考》，從體例到呈現廣東才女性別觀的方式，都相對傳統、保守許多。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冼玉清以目錄學方式書寫廣東才女史，反而能跳脫陳東原建立的五四史觀，給予廣東傳統才女生活較為立體、豐富的認識。

因此，也可說冼玉清在《廣東女子藝文考》，展現廣東才女保守與創新並存的樣貌，其實反映清末嶺南地區女性特殊的性別意識。例如：廣東女性獨身，本來就有地方社會傳統的獨特面向，嶺南地區「不落家」、「自梳女」風俗，與「粵俗男女之辨最嚴，可為各省之冠，而順德等處，家庭之壓制尤甚」制度有關，華南養蠶業式微以後，大量自梳女往香港、澳門、新加坡等地作「住家工」，澳門亦有自梳女居住的婆仔屋，她們積極參與天主教會與社區事務。⁹⁰ 不過，

88 胡倩，〈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價值三論〉，《澳門研究》，期 80（2016 年 3 月），頁 186-188。

89 衣若蘭，〈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與「五四婦女史觀」再思〉，《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34（2019 年 12 月），頁 18-24。

90 老漢（胡漢民），〈粵中女子之不嫁者〉，《新世紀》（巴黎），號

在廖小菁針對珠江三角洲女神崇拜的研究中，指出明清泛珠江三角地區女性拒婚現象不一定挑戰父系體制威權，何仙姑信仰在明清時期的發展，抗婚的反叛潛力是透過地方菁英操作，成為強化新形態家父長制度的文化資源。⁹¹ 如此，從明清至民國嶺南地區女性不婚選擇，與地方宗族之間的複雜關係來看，洗玉清對妻職、母職的詮釋，確實沒有脫離「賢妻良母主義」太遠。如：她在《廣東女子藝文考》中評價廣東才女李晚芳與謝端方時，除突出兩人經史論著前人未發，通鑑史、工詩詞，也讚她們「尤能善事舅姑，相夫子」⁹²、「鞠育恩勤，夜篝燈課之讀」⁹³。不過，從洗玉清接受灌根學校新式女子教育啓蒙的歷程來看，她對廣東才女的考察，映照職業女性「立業」與「成家」的矛盾，特別是知識女性在學術場域取得位置後的掙扎，持續在女性身上糾纏、拉扯。⁹⁴

60 (1908年8月)，頁10。珠江三角洲「自梳女」與「不落家」傳統相關研究，還可參劉志偉，〈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墳」及其傳說〉，收入劉永華主編，《中國社會文化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307-322。

- 91 廖小菁，〈神龕上的祖姑婆：何仙姑信仰與泛珠江三角地區的女性崇拜〉，《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26（2015年12月），頁167。
- 92 洗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頁1。
- 93 洗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頁29。
- 94 新知識女性陳衡哲在〈女子教育的根本問題〉一文中，就新女性事業、家庭難兩全的狀況做出說明：「婦女在結婚以後，家庭占了她大部分的生命，在普遍以為女性天賦為家務育兒的天賦之下，倘若女性的天賦逸出了家庭範圍之外企圖在職場上有所成就，那名女子很可能注定得抱持著獨身主義終其一生。」陳衡哲困於高等教育事業與妻職、母職之間，認為母職為女人的天性；因此，對於家庭與事業如何平衡，她終生在兩者之間搖擺。衡哲，〈女子教育的根本問題〉，《獨立評論》（北平），期32（1932年12月），頁13-16。

三、女性史家的家國關懷： 重劃澳門維新運動的歷史定位

洗玉清嶺南文史研究的重層視域，不僅表現在嶺南婦女文獻考。其中，對澳門在近代中國革命史上的重新定位，過去比較少被研究者注意。在 1964 年出版的《廣東文獻叢談》，有一篇〈談清末《知新報》——廣東大力提倡變法維新的報紙〉論及廣東維新派與澳門社會發展的聯繫。此外，收錄於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5 年出版的《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中，還有一篇遺稿〈澳門與維新運動〉。⁹⁵ 本文認為，這兩篇文獻應視為洗玉清以嶺南重層文化視野來建構廣東文獻，是目前較早將澳門與廣東、香港的文化互動，納入廣東文獻學範圍的作品。同時，在這一系列歷史掌故中，隱含一位女性史學家治地方史以展現家國關懷的企圖。從她對澳門報刊與社團的考察，能看到澳門公共領域形成，對中國近代革命的影響。洗玉清的澳門研究，經常奠基於她在澳門生活的親身觀察，也可反過來作為分析她知識體系養成的線索。因此，本文希望探究她在嶺南研究框架中，如何突出中國近代革命史上澳門的重要性。⁹⁶

清末以來，知識分子發展國族想像，促進「現代國家」形成，公領域的重整也觸及私領域重新界定，個體與群體在

95 洗玉清，〈澳門與維新運動〉，《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卷 6，頁 619-622。洗玉清，〈談清末《知新報》——廣東大力提倡變法維新的報紙〉，收入洗玉清著，《廣東文獻叢談》（香港：中華書局，1965），頁 21-23。

96 吳倫霓霞，〈香港反清革命宣傳報刊及其與南洋的聯繫〉，《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卷 19（1988 年 1 月），頁 407-422。

近代中國的重新建構，成爲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因此，近代史學者借用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概念，試圖解釋中國有無「公共領域」？爭論「公共領域」在中國興起時間爲何？⁹⁷ 其與現代性有無關係？哈伯馬斯主張，17、18世紀歐洲社會，出現特定空間，包括實質與抽象，讓來自各階層的市民發表意見，參與者對社會議題的批判力，對政治改革產生巨大影響力。雖然多數學者認爲西方“public”與“private”與中國「公」和「私」是難以互訓的概念，而「公共領域」概念與中國近代社會發展充滿差異，不應直接套用。不過，黃克武也指出，西方歷史經驗還是有助於處理中國歷史問題，特別是西方概念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影響中國思想觀，亦是值得探究的議題。⁹⁸

97 羅威廉（William T. Rowe）、蕭邦齊（Keith Schoppa）、芮蘭欽（Mary Rankin）認爲，清末民初已經有類似哈伯馬斯論歐洲政治社會史的公共領域出現。也就是王鴻泰所提出「公眾生活」來指涉明清城市消費空間的擴張。但是，也引來如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孔復禮（Philip Kuhn）對羅威廉主張「公共領域」的批評。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William T. Rowe, “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16:3 (July 1990), pp. 309-329. R. Keith Schoppa,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王鴻泰，〈從消費的空間到空間的消費——明清城市中的酒樓與茶館〉，《新史學》，卷11期3（2000年9月），頁1-48。

98 對於中國近代史討論中，中西「公」與「私」概念互訓的討論，參考黃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黃克武〈引言〉提供前述議題在史學界的爭論背景與學術發展脈絡，以及可拓展的方向。另外，中國有無公共領域的爭論，羅威廉反駁清末中國「公」的觀念與public近似，而公共領域可作為分析中國社會的參考架構。王笛認爲，冉致鑠、羅威廉、全大偉的研究，並不存在誤用哈伯馬斯概念的問題，因

此外，連玲玲在討論近代中國小報研究方法時，提到「公共領域」概念對近代報刊理論影響至深，中國史研究者也將報刊視爲具有政治意涵的公共領域，雖然「公共領域」定義不全適用於小報，弗拉塞（Nancy Fraser）提供的「多元」（multiple）、「另類」（alternative）公共領域概念，則可以更細緻的將不同種類的報刊納入討論。⁹⁹

由於澳門中西交流開始得非常早，也非常頻繁，報業有葡萄牙殖民的歷史背景，也有中國官方、維新與革命分子的社會運動與媒體發展，很多時候是各方勢力合作的結果。如孫文與葡萄牙人費南德斯（Francisco H. Fernandes, 1863-1923）共同創辦《鏡海叢報》，藉報紙鼓吹革命思想，對中國政治產生影響。¹⁰⁰ 此外，維新派與革命黨人在清末聚集澳門，組織不少傳播新知、具有社會改革意義的社團，讓不同階層的人民參與。這一段歷史在洗玉清撰文探討之前，澳門「公共領域」形成的情況，確實甚少人注意。她在〈談清末《知新報》——廣東大力提倡變法維新的報紙〉一文詳細考證《知新報》在澳門辦刊始末，是較早的《知新報》

為他們事先已申明與哈伯馬斯概念的區別。關於北美漢學界、臺灣與中國學界對於中國公共領域論述的爭論，參范純武，〈兩難之域：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爭議〉，《史耘》，期6（2000年9月），頁171-190。王笛，〈近代中國城市的公共領域〉，《二十一世紀》，期173（2019年6月），頁129-140。張志東，〈中國學者關於近代中國市民社會問題的研究：現狀與思考〉，《近代史研究》，期2（1998年3月），頁296-306。

99 連玲玲，〈導言：從小報看近代中國城市〉，收入《萬象小報：近代中國城市的文化、社會與政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頁1-22。

100 陳希亮，〈澳門與近代中國仁人志士〉，《東南文化》，總第126期（1999年8月），頁113。

研究。該文首先說明戊戌變法前夕，《知新報》作為中國三大提倡維新運動刊物之一，因「偏處廣東，所以知道它的還不很多」，也提到《知新報》最初擬名《廣時務報》，以示推廣上海《時務報》。後來，以此報宣傳維新主張，才定名為《知新報》。顯然，洗玉清寫作此文的時代，《知新報》雖作為維新派三大機關報之一，卻因處文化邊陲而未受重視。因此，她詳述《知新報》創辦史，諸如發行地遍及海內外、編輯與翻譯班底陣容堅強等細節，強調該報對於全國社會改革具先鋒性影響，顯然意圖向世人推介《知新報》。¹⁰¹

由於廣東人的澳門敘事，經常以獵奇視角來呈現島上的文化混雜。因此，洗玉清《知新報》研究之所以有新意，也是因為她將維新派在澳門辦報的活動，置入澳門特殊政治與傳播環境來考察。清帝國衰微時，嶺南成為日本、歐美現代化思潮輸入口，蓄積改革力量，建構地方認同。澳門自明代便是廣東文人避禍地，當廣東維新派、革命派組織活動受中央政府壓抑時，澳門在中、葡帝國間的「雙重邊緣性」，正好扮演「承接者」角色。清末前，遷澳文人多具前朝遺民身分，致力保存舊文化；另一方面，因中央政府難治理形成的輿論開放性，使改革者能自由進行政治宣傳。¹⁰² 1896年10

101 洗玉清，〈談清末《知新報》〉，《廣東文獻叢談》，頁21-23。

102 張永春在〈澳門《知新報》與上海《時務報》之分合〉中指出，康有為選擇澳門作為創辦《知新報》的地點有多重考慮：一、「澳門地處華南，不受清政府管轄，具有特殊地理位置和社會條件，有利於維新運動的開展。」在北京強學會、上海強學會受挫告終的情況下，上海《時務報》雖發行量大，卻因受制於保守勢力而不能暢所欲言。梁啟超解釋《時務報》「開風氣，廣見聞」卻還不能「厭聽眾」，需在澳門另闢新報以加強譯介工作與批評時政。二、康有為推崇今文經公羊學，尊古文經的江南士人批評康有為學術多主觀臆測之謬誤，《時務

月，康有為訪澳，計畫辦報，獲澳門巨富何廷光（生卒年不詳）等人支持，¹⁰³ 決定讓澳門成為維新派華南宣傳基地。康有為委派弟弟康廣仁（1867-1898）與上海《時務報》主編梁啟超（1873-1929），到澳門大井頭街四號籌辦《知新報》。

《知新報》刊載的時政議論，有時甚至比上海《時務報》更加敢言。¹⁰⁴ 政變失敗後，維新派除了流亡國外，便避居港澳，轉移原先在廣東進行的改革活動。於是，1899年至1901年間，澳門「近內地通海外」的特性，使其成為維新派與海外組織聯絡與後勤基地。¹⁰⁵ 如：康有為、梁啟超流亡加拿

報》報館內也有章太炎與康門弟子學術爭論。另辦《知新報》宣傳康學，成為康門師徒赴澳門創刊的原因。因此，《知新報》較《時務報》發表更多康有為激進變法學說，也區分江南士人宣傳「新學」與「康學」學術取向的不同。張永春，〈澳門《知新報》與上海《時務報》之分合〉，《澳門研究》，總第65期（2012年4月），頁112-119。

103 康有為在〈我史〉「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三十九歲」自述1896年訪澳門與何廷光（何穗田）創《知新報》：「七月，與幼博弟遊羅浮。八月，遊香港。十月，至澳門，與何君穗田創辦《知新報》。將遊南洋，不果。穗田慷慨好義，力任報事。後還省城。」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冊4（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頁136。

104 參湯志鈞，《戊戌變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209。吳倫霓霞，〈香港反清革命宣傳報刊及其與南洋的聯繫〉，《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卷19（1988年1月），頁411。

105 康有為於加拿大創立「保皇會」〈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中，說明變法失敗後，在海外更加看重《知新報》在維新運動中的位置：「一、立總公司所，擇近內地通海外者為之。澳門《知新報》，橫濱《清議報》，皆港澳、日本忠義殷商合股所辦，主持正論，激昂忠愛，薄海共信，今公推為總公司所。兩報即為本公司之報，凡同志皆閱此二報。各埠捐款皆匯《知新報》、《清議報》妥收，……而《知新報》與香港接近，皆握外洋之樞，尤為辦事之主。港澳皆公舉忠義殷實鉅商為大總理，總管收支各款及公司中各事。更立協理、幹事、書記數人，皆公選通才志士任之，以通各埠，任各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

大時，就整合《知新報》與橫濱《清議報》，將總局設在澳門，並策劃「武裝勤王」活動。此外，中國同盟會成立後，也在澳門設立支部。可見澳門在清末已然成為容納路線相異的改革運動基地，也是新舊文化交鋒處。然而，在洗玉清撰文考證以前，《知新報》蓄積的社會改革能量、中西知識流通媒介，在清末曾提供批判中央政治的公共空間，其歷史意義恐怕未曾真正被突顯出來。

洗玉清詳細臚列報刊撰稿與翻譯班底，並加註編輯與供稿人籍貫，可以清楚看到《知新報》撰述者是由廣東各縣市與澳門在地知識分子組成，成為後人研究《知新報》基礎文獻材料，也留下維新派與澳門互動緊密的線索。如：劉楨麟（生卒年不詳）、陳士廉（生卒年不詳）與王覺任（生卒年不詳）長居澳門，徐勤（1873-1945）、韓文學（1864-1944）、陳繼儼（生卒年不詳）、吳恆煒（生卒年不詳）則被康有為從日本與廣東地方召至澳門組織維新運動。洗玉清評價《知新報》上刊載的評論是「文筆汪洋恣肆，作者多是康有為學生，可以代表『萬木草堂』的文派」¹⁰⁶，指出《知新報》創作班底由澳門弟子組成，定調為南方發揚康學代表刊物，與上海《時務報》做出區隔。同時，洗玉清引梁啟超敘例，說明《時務報》「篇幅隘短，編誌漏略。記事則西多而中少，譯報則政詳而藝略」，並總結《知新報》是「用補其偏」的後起之秀，雖然地處偏遠，但內容較《時務報》全面，補足維新派過度重視西方知識的問題。洗玉清說明二者雖同樣通行多省，但《知新報》在廣東省內，包括香港與佛山等設立

編，《康有為與保皇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87-89。

106 洗玉清，〈談清末《知新報》〉，《廣東文獻叢談》，頁22。

派辦點，更深入華南地區讀者。¹⁰⁷ 她註記海外經銷地，遍及北美重要城市與澳洲、東南亞地區，是目前完整度最高的《知新報》銷售紀錄。冼玉清不厭其煩列舉該報在廣東與海外發行地，以傳播史角度，將長久被忽視的《知新報》與《時務報》相提並論。

冼玉清還特別標舉翻譯班底實力，凸顯澳門多語文化的辦報環境，擁有大量翻譯人才資源的優勢：「譯美國刊物的有新會甘若雲，譯日文的有香山（即今中山）唐振超，譯葡文的有葡人宋次生，譯德文的有德人沙士，譯法文的有葡人羅渣，可謂人才濟濟。」¹⁰⁸ 澳門從明代開始，就是歐洲傳教士赴華傳教中繼站，西文印刷、報業發展早，除 1822 年創辦的葡文週報《蜜蜂華報》（*A Abelha da China*）是中國第一份西文報刊外，還擁有中國第一份中、英雙語報刊《依涇雜說》（1837），譯介歐美新知，後因批判清政府弊端而被查禁。¹⁰⁹ 可見清末澳門公共領域形成，很早就利用籌辦

107 冼玉清，〈談清末《知新報》〉，《廣東文獻叢談》，頁 22。

108 冼玉清，〈談清末《知新報》〉，《廣東文獻叢談》，頁 23。

109 據〈外夷留心中國文字政事〉（道光二十六年）記載，《澳門月報》曰：「中國官府全不知外國之政事，又不詢問考求，故至今中國仍不知西洋，猶如我等至今未知利未亞洲內地之事。……日本國本年各有一秒報，考求天下各國諸事，皆甚留神。」《澳門月報》很早就注意歐洲國家對中國風土、文化與經典著作的關注，日本等亞洲國家對「西洋」報刊已留神國際事務，批評清帝國官府不考求外國政事。同時，也提及創辦於道光十七八年的《依涇雜說》：「乃西洋人士羅所印，由英吉利字譯出中國字，以中國木板會合英吉利活字版同印在一篇。序云：數百年前英吉利有一掌教僧，將本國言語同納體那言語同印，今仿其法，所言皆中國人之文字。此書初出時，中國人爭購之，因其中多有譏刺官府之陋規，遂為官府禁止。」由於《澳門月報》是林則徐摘譯澳門西文報紙國外要聞輯錄而成的刊物；可以看到外國人在澳門辦報對清帝國官員的影響。參姚瑩（1785-1852），〈外夷留心中國

現代報刊，對外掌握國際情勢，對內批判中央政府。此外，澳門西文報也是清政府官員認識國外要聞，與對中政策渠道，林則徐曾命人翻譯國外新聞，輯錄成目前所知中國第一份譯報《澳門月報》¹¹⁰。

明代以來，澳門作為天主教傳教基地，許多義大利、葡萄牙傳教士在此建立遠東漢學學院，學習中國文史思想，培養精通漢語、粵語的翻譯。此外，葡萄牙政府 19 世紀開埠以後為治理澳門華人，1865 年就組織屬公務員編制，與中國各地地方政府溝通的翻譯員培訓機構；又於 1885 年將華務廳獨立為華務署，加強華人事務溝通與管理，專主翻譯工作。澳門政府在 20 世紀初正式建立翻譯學校，要求翻譯員掌握多種外語，培育許多實力堅強的外交翻譯人才。¹¹¹ 如：

文字政事》，《康輶紀行》，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輯 1，頁 269。

110 參周佳榮，〈澳門報刊的歷史〉，灼見名家，<https://www.master-insight.com/澳門報刊的歷史/>（2022 年 7 月 4 日檢索）。林則徐譯西文報抄校本輯錄為「澳門新聞紙」，經加工編選後為《澳門月報》，收錄於魏源《海國圖志》。關於《澳門新聞紙》與《澳門月報》的關係以及定位，參蘇精，《林則徐看見的世界：《澳門新聞紙》的原文與譯文》（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陳原，〈林則 3 徐譯書〉，《人民日報》（北京），1961 年 5 月 4 日，第 7 版。

111 根據李長森考察，16 世紀末開始，以澳門為基地的傳教士熱心學習漢語，許多介紹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著作都要仰仗傳教士參與翻譯。19 世紀葡萄牙取得澳門治權之後，原先華葡共處分治的局面完全被打破，語言溝通立即成為問題。因此，成立於 1865 年的翻譯隊伍已經設有一等翻譯員、二等翻譯員、見習翻譯員制度，已具備翻譯學校雛形。1885 年澳葡政府頒布法令將華人事務辦公室從事理官公署獨立出來升格為華務署，加強行政當局與華人溝通，因此，翻譯成為最重要的工作，必須設立正規培訓機構。不過，針對澳門官方翻譯學校設立時間，李長森也說明學界有爭議。不過，綜合不同學者意見，還是可以確定

洗玉清列舉翻譯葡文的土生葡人宋次生（1862-1932），就是從華務廳見習翻譯開始，升到廳長，成為澳門知名漢語研究者。¹¹² 前述澳門殖民史和歐洲遠東傳教環境，皆是《知新報》實現翻譯引介歐洲新知，以達國民啓蒙、推動中國現代化理念的有利條件。洗玉清〈談清末《知新報》——廣東大力提倡變法維新的報紙〉，正是較早突出清末澳門公意識形成的文獻。

洗玉清雖無考察澳門媒體與廣東互動關係，但是，若結合另一篇短論〈澳門與維新運動〉，引述創辦人之一吳恆煒〈辦報緣起〉說明《知新報》創刊目的為「指斥科舉無用，希望國人努力實學，變法維新」，便可以看出她凸顯澳門維新報刊介入中國政治改革的用心。¹¹³ 她稱讚該報言論「對於中國政治腐敗，也直言不諱。對於帝國主義打算瓜分中國，亦言之鑿鑿」，突出澳門媒體環境提供維新派人士批評時弊的自由。她又另外列舉國內近事報導，記載眾多會黨資

最早從 1905 年成立最晚為 1914 年，是洗玉清在澳門求學期間。參李長森，〈百年搖籃，樹老花香——澳門理工學院中葡翻譯課程百年滄桑〉，《澳門理工學報》，期 19（2005 年 10 月），頁 47-57。

112 宋次生（Carlos Augusto Rocha d'Assumpção）1862 年生於澳門，1879 年在華務廳成為二等見習翻譯，1898 年被提升為一等譯員，拔擢為廳長。在翻譯與外交才能之外，宋次生的漢語研究成就也使他在澳門成為很有影響力的中國專家。除此之外，他也是《澳門土生回聲報》週刊的創辦人。參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澳門編年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卷 5，頁 2507。

113 吳恆煒，〈知新報緣起〉：「譯環球之近事，異聞必錄，不襲陳言；利病備陳，無取深諱。倡提聖學，無味本原；采譯新書，旁搜雜事；審其技藝，窮其新理，則明者勢不抱曲學而愈愚矣。察其土俗，知其形勢，則通者勢不泥舊章而解蔽矣。明其律法，諸其機權，強者勢不執法而振弱矣」。吳恆煒，〈知新報緣起〉，《知新報》（澳門），冊 3，1987 年（光緒 23 年 2 月初 1），頁 3。

料，包括強學會、經學會、籌學會、孔教會、女學會等推動國民現代化的維新組織，一方面說明《知新報》雖處帝國邊緣，卻有關照全國社會革新運動的格局，又直指中央政府腐敗。¹¹⁴ 另一方面，雖然《知新報》於光緒 27 年（1902 年 2 月）停刊時洗玉清僅 6 歲，不能判定她直接受啓蒙；但是，她在《廣東文獻考》中，特別關注維新派在澳門的活動，可見廣東改革人士利用偏遠殖民地自由氣氛，建構嶺南地區公意識，帶給澳門文化人批評時政、接受新知、參與中央政治改革的機會，對於洗玉清的知識養成，恐怕不能說沒有影響。

她在〈澳門與維新運動〉中，清楚指出澳門承接維新運動遺緒，在當地持續發酵。據洗玉清觀察，澳門因物價低廉，且海鮮飲食供應無虞，「當時康有為、徐勤、麥孟華、張壽波等，皆家居於此，而名流之設塾講學者尤多。因此地為開明人士所聚居，故亦維新思潮運動之要地」。¹¹⁵ 她在該文記述，清末幾個前瞻性社會改革組織，如：天足會、戒菸會、戒蓄婢會、閱書報社等，反而都聚集在澳門，以荷蘭園街的「原生學會」為據點談學論政。其中有些社團與香港、廣東組織連動，甚至成為領先全國的人權解放行動。洗玉清也表達她對澳門維新組織的評價：「此等諸會，今日雖視為無足輕重，然在 60 年前，亦所謂雄雞一鳴，天下振動者也。」¹¹⁶ 她欲藉相關廣東文史考證，使澳門在中國近代改革運動中的

114 洗玉清，〈澳門與維新運動〉，《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卷 6，頁 619-622。

115 洗玉清，〈澳門與維新運動〉，《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卷 6，頁 619。

116 洗玉清，〈澳門與維新運動〉，《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卷 6，頁 619。

位置重新被挖掘，其意圖相當明確。透過洗玉清的書寫，當代讀者能夠重新發現清末澳門「公共領域」逐漸形成的過程，看見過去曾有一段歷史時期，嶺南知識分子利用澳門地理、政治與文化的多重邊緣性積極辦報、組織社團，創造出一個充滿活力與改革希望的思想空間。

四、地方與國家： 粵謳研究、地方意識中的民族主義

洗玉清嶺南學貢獻已受許多學者肯定，但少關注她為地方缺乏書寫表達思想而投身考據的理念。本文認為，從洗玉清關注澳門公共領域形成，以及廣東、澳門革命運動的交流，可以說北方經驗給予她全國性的史學視野，使她再一次認識建立南方學的重要。依王汎森分殊地方與核心區文化互動關係來觀察，南歸後洗玉清一方面以「連結點」(linkage)活躍於廣東文化場域，聯繫核心區與地方思想活動，另一方面又作為整合澳門與廣東知識由下向上，由邊緣向核心擴散的「轉換者」。例如：《廣東文獻叢談》中收錄的文章，有一大部分發表在香港《大公報》，陸鍵東稱這些短文是洗玉清在新政權思想管制之後學術人生斷裂，「牛刀殺雞」式的考據。¹¹⁷ 然而，也正是這些歷史掌故，突出近代廣東少為人知的重要人才、器物、科技與特殊風俗，凸顯洗玉清相異於清代考證學與地方思維不相聯繫的路線。這一系列歷史掌

117 參陸鍵東，〈一個女子與一個時代〉，《純文學》，復刊第2期（1998年6月），頁101-102。

故，從日常史角度構築嶺南文化，在全國性學術思想審查環境中，成為她持續在地方利用媒體表達思考（intellection）¹¹⁸的方式。¹¹⁹ 而她的澳門關懷，也在微觀史中得以顯現。

冼玉清在〈檢討我的治學與教學〉表白投入廣東文獻緣由：「是因為我查書而請教老先生時，他們說廣東僻處一隅，外省人不會留心它的掌故，至於本省學者又極少，我便努力往這方面鑽……。」¹²⁰ 她在同一份檢討報告又主張國家若毀棄傳統文化，嚴重程度不下於亡國，「自省」過去的治學方法已不合時宜。就算在 1950 年代幾次經歷政治暗潮，冼玉清晚年試著在研究中加入馬克思主義史觀，但她治嶺南文獻的方法還是堅持樸學傳統，延續晚清地方知識分子的精神，將傳承舊文化與國家興亡意識結合在一起。學者王美怡亦突出晚清民國嶺南同時作為革命思想與樸學傳統發展基地的特性，指出葉恭綽《廣東叢書》強調整理古籍之所以重要，乃因缺乏山川民情的考察記載，將影響國家民族前途。她認為冼玉清治廣東文獻學的「殉學」使命，一方面繼承嶺南學人有責任考察嶺南文化的傳統；另一方面，也受陳子褒

118 參陸鍵東，〈一個女子與一個時代〉，《純文學》，復刊第2期（1998年6月），頁21-23。

119 王汎森在〈「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對「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中，指出清代學術主流考證學興盛時，知識分子學問極端精英化、抽象化，與地方、民間思維缺乏聯繫。另一方面，「地方」經常缺乏書寫文獻表達思想；但是，在這種區域的限制性下，地方有屬於地方的表達思考方式（intellections），可以從這樣的歷史視野看到地方社會細緻的活動。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新北：聯經，2017），頁318-322。

120 冼玉清，〈檢討我的治學與教學〉，轉引陸鍵東〈一個女子與一個時代〉，《純文學》，復刊第2期（1998年6月），頁25。

紮實訓詁考據訓練影響。¹²¹ 1929 至 1930 年間，冼玉清放棄進入北京名校講學，主要原因為鍾榮光在強烈的嶺南地方認同基礎上，對她動之以情：

嶺大正需人，尤需一心一意以教育為終身事業之人。嶺大為吾子母校，人地相宜，且無政治色彩，對吾子最為適合。北京為全國精華所聚，燕大、清華不患無人，惟嶺南僻處海隅，聘人不易，故吾子必須服務母校，嶺南亦終不會負吾子。¹²²

雖然陸鍵東感嘆，回嶺大任教使冼玉清一生「只是一名『嶺南女詩人、女學者、廣東文獻學專家』」。然而，對照冼玉清終身投入廣東文獻的緣由，鍾榮光的勸說與她決定南歸任教，都一再表現出嶺南知識分子時時將南方置入全國文化版圖來自我定位的「邊緣自覺」。而這種自覺的邊緣，深刻影響她的生命抉擇，表現在方方面面，包括為教育獨身的「殉學」主張，挖掘嶺南特殊女性材料，為陳子褒、澳門公共領域找到歷史定位，並為嶺南遭讒蒙冤的有志之士翻案。

從冼玉清嶺南文史考據，能看到澳門知識分子承繼近代廣東文化興起的地方意識與民族主義傳統。¹²³ 其中，對於

121 王美怡，〈冼玉清與廣東文獻整理研究〉，《開放時代》，期 12（2011 年 12 月），頁 61-77。

122 黃任潮，〈冼玉清教授傳略〉，收入丁身尊主編，《廣東文史資料》，輯 64，頁 24。

123 程美寶指出，17 世紀以來，廣東的地理位置，成為中國與世界的交流、衝突地。晚清革命黨還曾因對抗清政府，提倡廣東獨立說。梁啟超論廣東民族、風俗、語言皆與他地異，「故其人頗有獨立之想，有進取之志」。康有為學生歐礪甲，1901 年在〈新廣東〉一文中，明確提出「廣東自立」、「獨立國」主張，呼籲脫離清帝國統治，獲得平等自由。一直到民初，廣東地方派系仍持續與中央權力抗衡。另一方面，

廣東方言、音樂和嶺南「情」與「革命」之間的關聯，完成於晚年的〈粵謳與晚清政治〉，¹²⁴ 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洗玉清終生沉浸嶺南文史研究，並且從粵語、廣東通俗文學理解近代中國革命史，不能忽略陳子褒教科書改革注重白話、粵語教育，建立地方意識的影響。陳子褒在澳門的教育實踐，使他成為「全國編寫通俗小學教科書的第一人」。從洗玉清編纂陳子褒《教育遺議》可以發現，早在 1898 年〈八股文言之禍中國〉、〈論報章宜改用淺說〉中，他就觀察廣東人閱讀率較日本低落，主張改革八股文言教育以達知識普及。而在北方通用語不通行的南方，陳子褒延續並改良康有為提倡南音、土諺、歌謠入童蒙教育的理念，並比較古今、各省方言用語變化解釋「雅俗無定」，更進一步從觀念上打破重雅輕俗窠臼，受到洗玉清推崇。¹²⁵ 在這樣的基礎上，陳子褒「不忍廣東之童男童女受以上諸苦，而讀外省人之讀本以加多一重窒礙也。」¹²⁶ 他特別指出經傳皆北人為

19 世紀廣東發生許多中央與地方的政治衝突，晚清至民初提倡變革的知識分子、中華民國建國、北洋政府、國民政府重要官僚都是廣東人。因此，晚清廣東知識分子在經歷社會變革的過程，不斷塑造、定義國家觀與地方意識。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頁 32-36。

124 洗玉清，〈粵謳與晚清政治〉，收入佛山大學文史研究室、廣東省文史館編，《洗玉清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4），頁 288。

125 陳子褒寫於光緒 23 年的〈俗話說〉，實際舉了江蘇俗話謂「我」為「儂」，在廣東則為雅語。廣東俗話稱雨傘為「遮」，在北京則為雅。以實用角度來看，人必先學家鄉話再學京話，先學中國俗語而後學外國話。洗玉清編後語稱讚提倡陳子褒的方言、俗語識字教育是實用之學，指出「至於今日之言文學改良者，一則曰白話化，再則曰大眾化，而不知先生已於五十年前獨排眾議而倡論之。其眼光之遠大如此。」陳子褒，〈俗話說〉，收入陳子褒著，《教育遺議》，頁 17-19。

126 陳子褒，〈論初等小學讀本〉，收入陳子褒著，《教育遺議》，頁 70。

之，「而廣東語言又為南方中之特別質，故經傳之語助字，與方言語氣渺不相屬。」決意編寫、推廣粵語教科書，「以粗俗之方言，解微妙之語氣。」¹²⁷ 又辦《婦孺報》。他在言文分離造成教學障礙的脈絡中，洞察日常語言與世界觀建立、思想啓蒙之間的緊密關係，實際將粵語「識字」、「解字」實行於教育現場，作為認識文言文與經典的中介，提升至民族興衰之根本。¹²⁸ 冼玉清極力讚賞陳子褒方言教育在嶺南區施行的實績：「惟先生為通儒而兼教育家，編一書必經數年實地試驗然後刊行。故當時學生讀其書者，聲入心通，日日進步，真有如遊琉璃世界之妙。」¹²⁹ 從她的評註可以看到，冼玉清過去在灌根學校接受的教育，是建立在強烈的南北差異意識上，透過粵語認識古代經典、按部就班建立世界觀，同時形塑地方意識。

有關陳子褒粵語教育的貢獻，李婉薇〈母語教育的先驅——論陳子褒的粵語教科書〉已經深入討論，在此不贅述。不過，從前述陳子褒方言、俗語教育和國家改革的論述來看，〈粵謳與晚清政治〉從嶺南俗文學語言表現形式與傳播、情動力，考察近代民主革命的時代肌理，似乎可以找到

127 陳子褒，〈小學釋詞敘〉，收入陳子褒著，《教育遺議》，頁 51。

128 據李婉薇考察，方言俗講始終在民間教育中起到重要作用。不過，她也提出在北方通用語成為教科書語言時，其他地區教科書應該如何通俗化，是值得探究的問題。因此，陳子褒粵語教科書就成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對象。他彌補言文分離的教學方法：「深刻意識到廣東兒童只會說粵語，卻要用外省教科書的話，在學習上會遇到很多障礙。」參李婉薇，〈母語教育的先驅〉，《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卷 21 期 1（2011 年 3 月），頁 153-160。

129 冼玉清對陳子褒〈論初等小學讀本〉之評註，見陳子褒，《教育遺議》，頁 70。

一脈相承的思維。此外，澳門、香港殖民地環境，也促成陳子褒、冼玉清的民族主義。《教育遺議》收錄陳子褒寫於1921年的〈改良外國地理教科書議案〉，他向教育會建議外國地理教科書改革，首先應派人調查華僑聚居最多之南美，增補教科書中對該地地理的全面性認識。他表示自己居日考察時便有此構想，無奈「蜷伏澳門，地僻人陋，無從著議」，1916年遷港才有資源託人進行調查。¹³⁰ 針對該議案，冼玉清進一步註解：

教會學校地理科，有注重外國地理而忽略本國地理者。香港澳門之書院，有社讀外國地理而不讀中國地理者，豈不悲哉。故曰欲國民之愛國，必自認是本國史地始。¹³¹

澳門、香港教會學校與書院地理教育西化，以及華人學校不受殖民政府與中國政府重視，使陳子褒與冼玉清特別擔憂港澳學生的國家認同，發展出以民族主義為基礎來建構外國地理的方案。這種從「多重邊緣的自覺」中生發的國族主義，在〈粵謳與晚清政治〉中也會看到相近的思路。

粵謳為流傳在珠江三角地區的曲藝說唱，歌詞夾雜文言語白話體，並帶入大量粵語俚俗，廣受各階層聽眾歡迎。粵謳的起源學界有爭議，可以確定的是，是由清代中葉招子庸（生卒年不詳）令其真正流傳。〈粵謳與晚清政治〉細緻考辨粵謳如何因招子庸歌男女之情普及於世，又如何近代中

130 陳子褒，〈改良外國地理教科書議案〉，收入陳子褒著，《教育遺議》，頁195-198。

131 冼玉清對陳子褒〈改良外國地理教科書議案〉之註解，見陳子褒，《教育遺議》，頁198。

國民主革命中，配合報刊媒體發展，在廣東地區轉化為民間社會寫實、愛國主義政治宣傳的有力媒介，抵抗英美帝國殖民、入侵。招子庸與澳門也有淵源，他在澳門望廈村趙允菁私塾受啓蒙教育，洗玉清〈招子庸研究〉（1947）評述「允菁爲澳門人，乾隆六年舉人，始興縣訓導。（光緒《香山縣志·選舉表》）精《易》學。子庸得此賢師，故根柢甚美。」¹³² 因此，〈粵謳與晚清政治〉其實藏有她嶺南文史研究的重層視域。不過，〈粵謳與晚清政治〉在洗玉清過世近 20 年後才公開發表在《嶺南文史》雜誌，接下來，洗玉清的遺作陸續被整理出版，也開始出現她忠黨愛國、具有民族主義情操的論述。1983 年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創辦《嶺南文史》，連續在第一、二、三期大篇幅刊出該文。置入 1980 年代中央政府確立廣東爲改革開放綜合實驗區的脈絡，這一波嶺南學建構，是基於代表中國文化傳統面向全球化。¹³³ 因此，〈粵謳與晚清政治〉在此時被挖掘面市，確實有國家欲標誌地方史中民族主義的政治意義。此外，洗玉清晚年完成許多嶺南文史研究，生前沒有機會發表，一直到過世以後才集結出版，如《廣東釋道考》。具有官方色彩的文化單位也開始出版她的文集，如：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與澳門歷史學會在洗玉清誕生百年後，在澳門、香港舉辦紀念活動。全國政協副主席、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馬萬祺撰寫〈緬懷洗玉清教授〉，《澳門日報》陸續刊登介紹性文章，舉辦「洗玉清書畫圖片

132 洗玉清，〈招子庸研究〉，收入佛山大學文史研究室、廣東省文史館編，《洗玉清文集》，頁 120。該文原刊於《嶺南學報》（廣州），卷 8 期 1（1947 年 12 月），頁 67-104。

133 肖自力，〈全球化進程中的嶺南文化〉，《嶺南學》，輯 2（2008 年 12 月），頁 14-17。

展」，並出版《洗玉清誕生百年紀念文集》、《洗玉清文集》等，不少生前未刊稿終於面市。前述紀念活動辦在1995年，活動定調為「突出了洗玉清的愛國精神、民族氣節和在教育、學術、藝術上的顯著成就，又是在洗的出生地澳門舉行的，因而受到了澳門各界的高度重視」¹³⁴，與1999年澳門政權移交前中共的文化準備工作息息相關。因此，1990年代以後，評論洗玉清的文章確實經常強化她的愛國主義，甚至主張她的晚年研究具有馬克斯思想。即使洗玉清曾表示「不論哪一個政府我也沒有關係，只要是能繼續讓我研究古物」，¹³⁵但是，在這一波「重新出土」的過程，她治地方史救國的民族主義，被置入區域政治去殖、新中國愛國主義的脈絡中，重新詮釋。

洗玉清在粵謳研究中強調19世紀末中國走上「半殖民地化」道路，粵謳因為用方言書寫而廣泛流傳於嶺南地區，又因為用方言反映社會現實，不同階層的聽眾都能傳唱，在這個時期成為嶺南民族主義激情的表達媒介。洗玉清特別從粵謳能念能唱、押韻用典不拘泥、文詞易懂易唱的形式條件，分析嶺南地區廣泛流行的原因。「在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過程中，配合了政治，灌輸了新的血液，成為革命人民鬥爭的武器。在各個歷史時期，起了宣傳鼓勵的偉大作用」¹³⁶。在處理粵謳特殊轉向時，洗玉清延續她對廣東維新派的關

134 佚名，〈嶺南才女洗玉清紀念活動在澳門、香港舉行〉，《嶺南文史》，期4（1995年12月），頁19。

135 洗玉清，〈洗玉清生平檔案〉，轉引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頁47。

136 洗玉清，〈粵謳與晚清政治〉，收入佛山大學文史研究室、廣東省文史館編，《洗玉清文集》，頁288。

注，指出戊戌變法雖然在政治上失敗，但在同盟會將愛國運動推向高峰前，維新派辦報爭取言論自由，對民權自治思想有重要啓蒙作用。因此，她舉梁啓超看重通俗文學對政治宣傳的效用，在日本辦《新小說》（1903）月刊，有意識運用粵謳宣傳維新思想。此外，興中會在香港辦的報紙《中國日報》闢「鼓吹錄」專欄，刊載戲曲、諧文、小說宣傳革命；其中，鄭貫公（1880-1906）到橫濱創《開智錄》，也同樣用戲曲諧文作政治宣傳。1902-1905年，鄭貫公在香港辦《世界公益報》、《廣東報》、《有所謂報》，更大量運用戲曲諧文抨擊政治，在1905年反美抵制外國貨運動具指導作用，為創舉。洗玉清又將清末廣東地方意識帶入，說明「具有光榮革命鬥爭經歷史傳統的廣東人民」，早在1841年三元里反英鬥爭中，就有歌謠〈顛地鬼〉、〈義律鬼〉，以簡樸語言傳唱「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嘲弄英國鴉片販。¹³⁷

不過，洗玉清的粵謳研究，並不僅僅單一呈現民眾與運動者的反殖面向。在導言中，她自陳研究動機，是因粵謳反映晚清複雜矛盾歷史：國際上人民反帝國主義侵略，國內則有反封建應推君主立憲還是革命的論戰。因此，據洗玉清考證，1904年香港總督金文泰，又曾將招子庸《粵謳》翻譯成英文，傳播到歐洲，稱其與希伯來民歌有一樣價值。她梳理廣東抗爭史，指出廣東反帝傳統使粵謳在這個題材上表現突出；而在反封建歷程中，維新派與革命黨都起於廣東，路線矛盾也反映在晚清粵謳口語化、通俗化傳唱中。如：鄭貫公寫於反美愛國運動，刊在《有所謂報》上〈真正係苦〉一謳：

137 洗玉清，〈粵謳與晚清政治〉，收入佛山大學文史研究室、廣東省文史館編，《洗玉清文集》，頁290-292。

「試想在本國既係咁艱難，來到外埠又咁苦痛，真正係地球雖大，無處可把身容。……唉！愁萬種，熱血如潮湧；但得漢人光復呀。重駛乜遠地為佣？！」洗玉清詮釋〈真正係苦〉代表性，係運用質樸粵語口語唱出美國廣東華工離散心理，又巧妙暗示應推翻清廷，才能從根本上解除華工苦痛。¹³⁸ 在〈粵謳與晚清政治〉裡，藉由洗玉清的研究，可以發現粵謳演變與傳播，恰好反映清末嶺南地區與中央政府、英國殖民政府之間微妙張力。

李錦全論洗玉清粵謳研究，反駁秦牧稱其不問政治，有封建時代閩秀作家風範，只在香港日佔期表達民族大義的說法，指出〈粵謳與晚清政治〉隱含洗玉清愛國主義思想。¹³⁹ 當然，學者以文章具備「愛國主義」與否來評價洗玉清的貢獻，出自「學術應為政治服務」的特殊語境，洗玉清自己也在導論提到粵謳在民主革命時期曾為政治服務，今日也應能為社會主義革命服務，是她晚年論學加入馬克斯主義思想的嘗試。但是，置入嶺南學術風格來看，陳仲章曾指出嶺南學術大事件中廣東民族主義抗戰背景，認為無論理學、樸學、經史、地理，經嶺學洗禮後都有變異與作用。¹⁴⁰ 洗玉清繼承樸學傳統，又能在嚴謹文獻考據工夫暗含政治理念，並關

138 鄭貫公，〈真正係苦〉，《有所謂報·諧部》（香港），1905年6月13日，第2版。參洗玉清，〈粵謳與晚清政治〉，收入佛山大學文史研究室、廣東省文史館編，《洗玉清文集》，頁287-295。

139 李錦全，〈洗玉清教授對粵謳研究中體現出的愛國思想〉，收入李宗桂、楊海文編，《李錦全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8），卷6，頁325-330。

140 如晚清陳澧能融貫經史，作考據義理，又重微言大義、學問全體大用。清末康、梁引介歐美思想，發起新文化啟蒙運動與維新變法，進而影響全國。參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頁164-212。

注方言通俗文學，從方法論上指出中國近代革命史研究，應從文學與史料相互印證來拓展詮釋面向，廣東通俗說唱文學即這段時期值得關注的重要材料，確實顯現嶺南學術特色。

結語

從諸多學人與她自身皆突出女性史家之不易來看，冼玉清在清末民國嶺南知識場域中，確實有難以忽視的特殊性。從廣東「革命聖地」在歷史上與中央政權始終保持張力，但民國後廣東文學與文化被低估的情況來看；冼玉清的研究與寫作實具「多重邊緣的自覺」：除了女性知識分子邊緣身分之外，還有嶺南文化相對中土的邊緣性，以及嶺南文化研究中澳門、香港位置的邊陲性。基於前述多重邊緣自覺，以及冼玉清在澳門、香港、廣東之間的知識交流，使她嶺南文史研究，具有「重層視域」特色。作為易代之際的女性知識分子，無論獨身宣言與《廣東女子藝文考》中「廣東才女與家庭說」，皆反映南方才女寫作與家庭複雜關係史，以及民國職業女性在家庭與事業間難兩全的衝突。

從冼玉清嶺南文獻學中澳門研究來看，澳門為葡萄牙租居地，很早就接受歐洲天主教思想資源，是廣東官員、文化人與世界文化的接觸地帶。此外，作為明代以來承接各方勢力的南天樂土，澳門一方面容納遺民文化，又形成維新派、革命分子發表改革言論的公領域，不受干預地進行運動，甚至反過來影響中央政府。透過冼玉清的研究，以及《教育遺議》編輯身分，筆者能夠後設地推導出澳門如何為冼玉清建立新舊折衝、共存的世界觀。陳子褒具先鋒意義的婦孺、方

言教育，既承繼廣東維新派中西合璧的國民教育理念，又較「萬木草堂」更務實地訓練文獻學基礎，深刻影響她的地方意識與女子國民意識。過去學者論維新思想在陳子褒教育改革中的關鍵位置；然而，是澳門給予他自由辦學、實踐理念的資源，培育出多元思想與行動的學生。雖然冼玉清自言香港花花世界不符合她的脾性，但是，中日戰爭期間，以及共產中國成立反右整風運動後，香港特殊媒體環境，給予冼玉清持續發表嶺南文史著作的自由空間。正是流轉於澳門、香港的經歷，使得冼玉清進入廣東學術場域後，將她的重層視域帶入嶺南文化研究領域中，學術眼光與生命情調互相對話，成為她難以取代的治學特色。

徵引書目

一、史料

佛山大學文史研究室、廣東省文史館編，《洗玉清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4。

洗玉清，《廣東文獻叢談》。香港：中華書局，1965。

洗玉清，〈澳門與維新運動〉，收入廣東省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卷6。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頁619-622。

洗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收入孫曉梅主編，《中國近現代女性學術叢刊續編》，冊2。北京：線裝書局，2013。

姚瑩，〈外夷留心中國文字政事〉，《康輶紀行》，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輯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253-272。

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冊4。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頁107-169。

陳子褒，《教育遺議》。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73。

二、報刊

《人民日報》（北京），1961年。

《有所謂報·諧部》（香港），1905年。

《東方雜誌》（上海），1939年。

《知新報》（澳門），1987年。

- 《新世紀》（巴黎），1908年。
《新潮》（香港），1948年。
《獨立評論》（北平），1932年。

三、專書

-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康有為與保皇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新北：聯經，2017。
- 印光任、張汝霖著，趙春晨校注，《澳門記略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
-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澳門編年史》，卷5。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 吳定宇主編，《中山大學校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 李蘭萍，《辛亥革命與廣東婦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
- 孫桂燕，《清末民初女權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 高彥頤，《閩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 張偉保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 從玉華、陳卓主編，《民國風度》。北京：中國計量出版社，2017。
- 陳樹榮，《洗玉清與澳門》。澳門：君亮堂出版社，2013。
- 陳樹榮主編，《洗玉清誕生百年紀念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
-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臺北縣：聯經，1997。

- 湯志鈞，《戊戌變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 黃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 黃啓臣，《澳門通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 廖子馨，《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1994。
- 劉人鵬，《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政治》。臺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
- 劉納編著，《呂碧城》。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
- 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 鄭煒明，《澳門文學史》。濟南：齊魯書社，2012。
- 蘇精，《林則徐看見的世界：《澳門新聞紙》的原文與譯文》。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 Rowe, William T.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Schoppa, R. Keith.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四、論文

- 方秀潔，〈重塑時空與主體：呂碧城《游廬瑣記》〉，收入張宏生、錢南秀編，《中國文學：傳統與現代的對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393-413。
- 王美怡，〈洗玉清與廣東文獻整理研究〉，《開放時代》，期 12，2011 年 12 月，頁 61-77。

- 王笛，〈近代中國城市的公共領域〉，《二十一世紀》，期 173，2019 年 6 月，頁 129-140。
- 王鴻泰，〈從消費的空間到空間的消費——明清城市中的酒樓與茶館〉，《新史學》，卷 11 期 3，2000 年 9 月，頁 1-48。
- 衣若蘭，〈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與「五四婦女史觀」再思〉，《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34，2019 年 12 月，頁 1-68。
- 佚名，〈嶺南才女洗玉清紀念活動在澳門、香港舉行〉，《嶺南文史》，期 4，1995 年 12 月，頁 19。
- 佚名，〈嶺南才女洗玉清〉，收入佛山炎黃文化研究會、佛山市政協文教體衛委員會編，《佛山歷史人物錄》。廣州：花城出版社，2004，頁 410-416。
- 吳倫霓霞，〈香港反清革命宣傳報刊及其與南洋的聯繫〉，《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卷 19，1988 年 1 月，頁 407-422。
- 李又寧，〈呂碧城生平〉，收入李又寧著，《近代中華婦女自敘詩文選》，輯 1。臺北縣：聯經，1980，頁 191-197。
- 李長森，〈百年搖籃，樹老花香——澳門理工學院中葡翻譯課程百年滄桑〉，《澳門理工學報》，期 19，2005 年 10 月，頁 47-57。
- 李婉薇，〈母語教育的先驅——論陳子褒的粵語教科書〉，《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卷 21 期 1，2011 年 3 月，頁 151-180。
- 李錦全，〈洗玉清教授對粵謳研究中體現出的愛國思想〉，收入李宗桂、楊海文編，《李錦全文集》，卷 6。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8，頁 325-330。
- 肖自力，〈全球化進程中的嶺南文化〉，《嶺南學》，輯 2，2008 年 12 月，頁 14-17。
- 社潮，〈精緻溫潤的人生——嶺南學人洗玉清〉，《決策與信息》，

期 340，2013 年 3 月，頁 62-64。

施立松，〈約素含娟總自然〉，收入施立松著，《民國風度：黑暗處的明燈》。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4，頁 327-334。

科大衛、劉志偉，〈宗族與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明清華南地區宗族發展的意識形態基礎〉，《歷史研究》，期 3，2000 年 6 月，頁 3-14。

胡倩，〈洗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價值三論〉，《澳門研究》，期 80，2016 年 3 月，頁 182-191、199。

胡曉真，〈藝文生命與身體政治——清代婦女文學史研究趨勢與展望〉，《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3，2005 年 12 月，頁 27-63。

胡曉真，〈酗酒、瘋癲與獨身——清代女性彈詞小說中的極端女性人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期 28，2006 年 3 月，頁 51-80。

胡曉真，〈杏壇與文壇——清末民初女性在傳統與現代抉擇情境下的教育與文學志業〉，《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5，2007 年 12 月，頁 35-75。

胡曉真，〈據象鬪戰或騎象入京？——南方女主的譜系建構與其文學敘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38，2022 年 12 月，頁 1-61。

范純武，〈兩難之域：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爭議〉，《史耘》，期 6，2000 年 9 月，頁 171-190。

韋慶遠，〈澳門史研究及澳門學〉，收入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編，《嶺南歷史與社會》。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3，頁 81-91。

唐小兵，〈「廣東文化」觀的建構——評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

- 家認同》〉，《二十一世紀》，期 103，2007 年 10 月，頁 134-140。
- 秦牧，〈關於嶺南女詩人洗玉清〉，收入佛山大學文史研究室、廣東省文史館編，《洗玉清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頁 1-5。
- 袁鍾仁，〈嶺南才女洗玉清〉，收入廣州市文史研究館編，《廣州的故事》，集 2。廣州：花城出版社，2005，頁 261-264。
- 張永春，〈澳門《知新報》與上海《時務報》之分合〉，《澳門研究》，總第 65 期，2012 年 4 月，頁 112-119。
- 張志東，〈中國學者關於近代中國市民社會問題的研究：現狀與思考〉，《近代史研究》，期 2，1998 年 3 月，頁 298-307。
- 連玲玲，〈走過五四：反傳統風潮下的知識婦女與婦女知識〉，《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33，2019 年 6 月，頁 i-vii。
- 連玲玲，〈導言：從小報看近代中國城市〉，收入《萬象小報：近代中國城市的文化、社會與政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頁 1-22。
- 陳仲章，〈廣東學術的今昔與今後學人的要務〉，《文會叢刊》，期 1，1948 年 9 月，頁 35-39。
- 陳希亮，〈澳門與近代中國仁人志士〉，《東南文化》，總第 126 期，1999 年 8 月，頁 111-113。
- 陸鍵東，〈一個女子與一個時代〉，《純文學》，復刊第 2 期，1998 年 6 月，頁 15-25、97-108。
- 喬玉紅，〈洗玉清與嶺南女性及文化研究〉，《山西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40 期 3，2013 年 5 月，頁 134-137。
- 喬玉紅、喬素玲、劉正剛，〈收聽女性的聲音：「嶺南學」建設應關注的話題〉，收入左鵬軍主編，《嶺南學》，輯 2。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頁 27-41。

- 游鑑明，〈千山我獨行？廿世紀前半期中國有關女性獨身的言論〉，《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9，2001 年 8 月，頁 121-187。
- 黃天驥，〈一粒蓮子一片冰心——懷念洗玉清教授〉，收入黃天驥著，《黃天驥文集》，冊 13。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
- 黃任潮，〈洗玉清的生平及其著作〉，《嶺南文史》，期 1，1983 年 5 月，頁 73-81。
- 黃任潮，〈洗玉清教授傳略〉，收入丁身尊主編，《廣東文史資料》，輯 64。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頁 103-124。
- 黃柏軍，〈洗玉清教授與《陳子褒先生教育遺議》〉，《濠鏡》，總第 27 期（2018 年 12 月），頁 132-140。
- 黃嫣梨，〈呂碧城與清末民初婦女教育〉，收入黃嫣梨著，《妝臺與妝臺以外——中國婦女研究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
- 廖小菁，〈神龕上的祖姑婆：何仙姑信仰與泛珠江三角地區的女性崇拜〉，《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6，2015 年 12 月，頁 133-191。
- 廖奉基，〈嶺南女學〉，收入美洲嶺南學校共進會，《美洲嶺南學校共進會報告書》。紐約：美洲嶺南學校共進會聯會，1918。
- 劉正剛，〈洗玉清與廣東方志資料的運用〉，收入徐爽編，《洗玉清研究紀念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 劉志偉，〈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墳」及其傳說〉，收入劉永華主編，《中國社會文化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 練銘志，〈關於洗夫人研究芻議〉，《嶺南文史》，期 1，1984 年 4 月，頁 22-24。
- 鄭煒明，〈讀洗玉清教授著作筆記〉，收入陳樹榮主編，《洗玉

- 清誕生百年紀念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
- 鄭潤培，〈澳門教育史研究述略〉，張偉保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 盧瑋鑾，〈讀冼玉清〉，收入盧瑋鑾著，《盧瑋鑾文編年選輯（1998-2019·浴火鳳凰）》。香港：三聯書店，2019，頁19-21。
- 錢乘旦，〈關於澳門學的幾點思考〉，《澳門理工學報》，卷23期4，2020年10月，頁25-31。
- 魏愛蓮，〈重拾過往——1636年至1941年間的女性編者與女性詩歌〉，收入方秀潔、魏愛蓮編，《跨越閩門：明清女性作家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 羅秀美，〈自我、空間與文化主體的流動／認同——以女詞人呂碧城（1883-1943）的散文為範圍〉，《興大中文學報》，期32，2012年12月，頁163-210。
- Faure, David. "Becoming Cantonese, the Ming Transition." In Tao Tao Lui and David Faure, eds., *Unity and Diversity: Local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i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 Rowe, Willian T. "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16:3, July 1990, pp. 309-329.

五、網路資料

- 周佳榮，〈澳門報刊的歷史〉，灼見名家，<https://www.master-insight.com/澳門報刊的歷史/>（2022年7月4日檢索）。

Self-Awareness of Multiple Margins: The Palimpsest Horizons of Lingnan Studies of Sin Yuk-ching

Yen Na *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era of China, among the few female scholars from Macau, Sin Yuk-ching (Xian Yuqing 洗玉清, 1895-1965), or more commonly known as the “Lingnan talented woman” 嶺南才女, was the most successful active female scholar and classical poet within the Lingnan male literati community. She was also the first to compile a bibliography of women’s works in the history of Lingnan and the pioneer of the academic lineage of women’s studies in Guangdong.

Throughout her life, Sin Yuk-ching moved between Macau,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and her Lingnan studies combined the Chinese cultures from the three regions as well as the “palimpsest horizons” formed by Portuguese and British colonial experiences. From the Ming dynasty onwards, Macau had become a “southern paradise” 南天樂土 and frequently interacted with the

*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Lingnan cultural community. On one hand, it was seen as a peripheral area to the Empire, but on the other, was a base from which China imported Western culture. Due to its immigration society and colonial history, the cultural circle of Macau not only ushered in tal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but also had some of its scholars move to different places such as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a trend which helped to develop the Lingnan academic style.

Among them, Sin Yuk-ching was one of the first scholars to discuss the importance of Macao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she worked tirelessly to uncover people and cultures at different margins within Lingnan literature. The present paper highlights Sin's "self-awareness of multiple margins," including those of Lingnan in relation to the cultural centers in the north, of Macau and Hong Kong within Lingnan studies, and of wome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she placed herself in the center of the intellectual field from the margin.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nalyzes and interprets the new Cantonese education Sin had received in Macau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era, how she brought a Macau experience back to Guangdong cultural circles by constructing Lingnan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studies in times of turmoil, and finally, how she demonstrated nationalism through historical writing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Keywords: female intellectual, Lingnan, Macao, talented woman, Sin Yuk-ching